

七、历史社会学

编选主持人 李 康

编选导言

本编选文所指的历史社会学,并不仅限于一种界限相对分明的分支社会学,即美国学界流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代表如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克波尔、巴林顿·摩尔等,注重宏观制度比较,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有较严格的区别),而是指一种研究视角:在社会研究中贯彻历史视角(Smith 1991),或在历史研究中融贯社会视角(Burke 2005)。

当代西方历史社会学愈益表现出与历史学中的社会史研究、人类学中的历史人类学、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心态史视角等既各有侧重又互为借鉴(Delanty & Isin eds. 2003)。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转向(人文学方面参见 McDonald ed. 1996; 社会科学方面参见 Hall & Bryant eds. 2005),正是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中多种具有一定共性的思潮共同推动的结果。

埃利亚斯、吉登斯、沃勒斯坦等注重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家(Skocpol ed. 1984),萨林斯、格尔兹、卡洛·金兹伯格等注重历史取向的人类学家(Hunt ed. 1989),E. P. 汤普森、纳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勒鲁瓦拉杜里等侧重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历史学家(Cabrera 2004),海登·怀特、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弗兰克·安克史密特等实践后现代话语分析和文学批评的史学理论家,以及哈贝马斯、福柯等难以归属传统学科的大师及其具有学科范式转型意义的社会历史研究著作(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规训与惩罚》),为晚近西方历史社会学乃至社会理论提供了主题、范畴和范式反思的共同平台。

而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心态史学、表征史学等思潮跨学科渗透的现象,记忆、身体、时间、空间、认同等范畴重新引入社会学研究的趋势,既体现了后现代思潮、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等对于当代社会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当代情境对自身经典范式的深层反思(参见 Adams et al eds. 2005)。

不过,虽然上述思潮、人物与著述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促进了对于许

多核心范畴的反思,推动了实质研究的素材拓展和方法创新,但仍然缺乏综合的研究框架来更好地总结成果、发现异同、互补短长。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都还比较局限于一些虚设的对立,比如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划分;传统社会史研究与新兴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主题分割;现代性建构(发展社会学、制度史)与后现代解构(文化研究、口述史、影视史学、心态史等)的叙事差异,等等。

与此互为因果的是,美、法、德、英等国社会历史研究传统之间缺乏充分交融促进(参见 Delanty & Isin eds. 2003; Macrauld & Taylor 2004)。比较美国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法国的年鉴史学、德国日常生活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意大利微观史学、日本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等传统,有助于体察历史社会学借鉴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研究的丰富的可能性。

国内目前对于上述学者和思潮的引介与应用特点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大体上各自为战,对整体图景缺乏认识。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研究、村庄史/区域史研究等领域借鉴较多,相关译作主要集中在法国年鉴史学(近年受台湾地区学界影响,开始重视心态史、表征史的转型)、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学界的社会史研究、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之间缺乏充分的学术交流与成果互补,历史社会学尚停留在从发展社会学的传统三阶段(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中走出来的起步阶段。相比于史学界和人类学界在历史转向方面的积极创新(常建华 2004; 孙江 2004; 杨念群等编 2003),社会学界的反应明显不够充分。

了解、评估、借鉴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历史社会学的趋向,重点是:

(1) 当代史学思潮中的心态史学、表征史学、新文化史、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具有不同程度的后现代意味,它们对于历史社会学已经和可能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对于社会学,这种借鉴是否必然有限度? 如果有,限度何在? 历史社会学揭示社会历史真相、撬启边缘人群声音的任务,与后现代思潮对一元真理、线性历史等宏大叙事的解构,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

(2) 传统史学中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当代转型,即所谓新社会史、新文化史,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

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和具体方法? 重视结构、制度的传统社会学研究, 如何面对重视体验、心态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3) 当代历史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已经和可能具有怎样的对话方式? 人类学的文化、历史比较观如何有助于破解传统社会学的静态结构视角, 融通结构历史与个体经验的关系, 如何有助于破解传统社会学中宏观—微观、结构—行动等二元对立?

(4) 历史社会学的趋向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整体变革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如何充分认识历史性社会研究打通宏观制度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心理两个层面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历史社会学领域中对于记忆、认同、时间等概念的反思性研究如何融入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建构?

(5) 整理华南地域宗族与民间信仰研究、江南市镇与近代经济研究、华北农村社会与现代国家形成研究、京津沪等现代城市文化与市民社会研究、四川地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等近年成果突出的学术研究群, 思考这些展示历史性社会研究视角的多学科研究的对话—整合途径。

大陆历史社会学未来的任务是交叉重叠的: 一则力求及时反映国际学界的最新进展, 二则充分重视历史人类学、新社会文化史与历史社会学的对话, 三则尽量吸收海外中国研究和台湾学者的优秀成果, 四则以积极开放而不失审慎的态度, 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研究的丰富成果, 综合利用多形态、多层面的社会历史研究素材。

这里的“读本”与其说是要明确地树立一门叫做“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研究领域或研究视角的“canon”(圣徒正册、著述范典和研究典范), 不如说是要使“历史社会学”这一提法重新进入问题意识, 通过出自不同学科纪律训练的学者一些发散性、综述性、开放性的勾勒, 展现历史性的社会研究在社会理论核心与中国研究、历史社会学与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的关联/表达(articulation)之中, 究竟具有怎样的多重可能或陷阱? 文献的选择受限于是否已有可用的中文著译、篇幅裁剪是否可行, 当然, 还有是否符合选编者本人的“眼光”(参见所选福柯文章)。

目前集中展示历史社会学领域广阔视角、经典文本、新锐研究的优秀读物, 中文可注意跟踪浙江人民

出版社的《新社会史》(以书代刊, 已出两辑)、大象出版社的《新史学》(以书代刊, 已出四辑)、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农村研究》(以书代刊, 已出三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与历史译丛”(已出 12 种)等; 英文方面, Gerard Delanty 与 Engin F. Isin 合编的《历史社会学手册》(Sage 2003)在远比美国传统的宏观制度比较式历史社会学宽广的视角里, 综述了历史社会学方面众多经典人物、研究视角和争论主题, 文献充分, 诱人深入, 是目前最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指南。而 Hall 与 Bryant 合编的四卷本《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 收集了包括考古学、地理学在内的历史性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经典文献, 蔚为大观。集中展示历史性社会研究进展的国际学术期刊主要是: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History & Memory, History & Anthropology, Past & Present, History & Theory 等, 各自体现了不同的学科视野、国别传统、办刊宗旨, 其中多种有电子版可查阅全文。

相关阅读书目

Adams, J., et al. eds. 2005,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ke.

Burke, P. 2005, *History & Social Theory*. 修订版, 初版中译为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Cabrera, M. 2004,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Lexington Press.

Delanty, G. & E. Isin eds. 2003,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Sage.

Hall, J. & J. Bryant eds. 2005, *Historical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 Vol I-IV. Sage.

Macrauld, D. & A. Taylor. 2004,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History*. Palgrave.

McDonald, T. ed. 1996,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Michigan.

Skocpol, T. ed.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Smith, D. 1991,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中译为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



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新社会史”论丛》第 1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录》（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下），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彼得·伯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导语：

本文选自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一章“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版，第 1~26 页；Peter Burke 1992,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olity*, chapter 1.）

本书是一位文化史研究世界名家将学术成果总结与前沿趋势开拓相结合的名著，1980 年、1992 年、2005 年三次出版，三次大改，中译所据为第二版。从选文中可以看出，这位真正从具体研究中的理论家，其问题意识一开始就超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之类的学科界限。

另外值得推荐的国内较早的类似综述，参见应星《当代社会理论中历史视角的回归》（原载《国外社会学》1997 年第 4—5 期“历史社会学”专辑。该刊在 1998 年、2001 年等有过多期“历史社会学”专辑）10 年前国内无论是社会理论还是历史社会学，出版的著作和译著、讨论的话题和各类调查研究都远不像今天这样红火甚至有些泛滥。但即使今天看来，文中表现出的那种深广、谦逊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仍然弥足珍贵。中国的历史社会学起步时，就有机会在 multidisciplinary 的借鉴、反思基础上，超越美国式的宏观制度比较的狭义的历史社会学。十年过去，其中许多具体介绍和引用文献已经有些“老套”，布迪厄、福柯、埃利亚斯等人也慢慢从前沿先锋进入“学科无意识”，但我们又将这种机会向现实推进了多少？我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译介面前/中间又进步了多少？

（李康）

原文：

聋子之间的对话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其如此）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邻居。若从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像社会人类学

家一样）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么他们又显然是学术上的近邻。也正是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不同于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或宗教、政治研究专家。

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发现某一社会在哪些方面是独具一格的。变化会结构化，而结构会发生变化。实际上，“结构化”（structuration）进程——就像一些社会学家所称的——近年来已成为关注的焦点。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可能使对方从不同的山头主义中解放出来。历史学家很可能陷入几乎是名副其实的山头主义，他们由于通常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区域，因而他们会渐渐地把他们的山头看做是完全独特的，而不是看成一系列因素的独特组合，进而也不会看到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地方也有类似物；社会理论家则在更隐喻的意义上表现出山头主义，即当他们只是基于当代经验对“社会”进行归纳，或在讨论社会变迁时不考虑长时段进程时，就产生了一种时间上而非地点上的山头主义。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挑剔对方的缺点。不幸的是，他们都以一种相当粗鲁的老套路看待对方。至少在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之以“科学的”标签的人；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似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他们之间的对话，正像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的那样，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

为理解这种状况，不妨将不同的学科看成是个性分明的职业甚至亚文化。它们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例如，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双方都明显犯了跟不上时代的错误。直到不久前,许多社会理论家还是这样看待历史学家的:他们几乎只关心叙述政治事件,19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兰克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至今似乎仍占主导地位。反过来也一样,有些历史学家仍然以为社会学自孔德后就止步不前,停留在19世纪中期大而化之的归纳的层面上,而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那么,历史学和社会学——或更一般地说,历史学和理论——之间到底如何形成了这种对立?它们怎样,为什么,又在何种程度已经克服了这种对立?……

历史学和理论的分野

18世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并没有争吵。原因很简单:那时,社会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法国法学理论家孟德斯鸠、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弗格森和John Millar后来一直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争夺。诚然,他们经常被描述为社会学的“开山鼻祖”。然而,这个标签却使人误以为这些学者着手创立了一门新学科,而实际上他们从未表达过这一意图。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被称为经济学创立者的亚当·斯密身上,他实际上生活在与弗格森和米勒一样的圈子里。

若将上述四位学者称作社会理论家则更妥当些,他们系统探讨的是所谓的“市民社会”,正如从柏拉图到洛克等更早的思想家讨论国家一样。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弗格森的《论市民社会》(1767年)、米勒的《地位差异的观察》(1771年)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67年)都关注一般理论,关注米勒所谓的“社会的哲学”。……依据主要生存方式的不同,他们共同区分出四种主要的社会类型:游猎、畜牧、农业以及商业社会。同样的核心概念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中也可找到,该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直到人类生存手段达到极限,人口才会停止增长。

人们也可以将这些社会理论家看成是重分析的,或借用18世纪的术语,是“哲学”历史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三篇所讨论的是“财富的积累”,实际上就是一部欧洲经济简史。孟德斯鸠撰写了一部有关罗马帝国兴衰史的历史专著;弗格森论述过“罗马共和国的进程及终结”;米勒论述过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马尔

萨斯则追随他之前的孟德斯鸠和休谟,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人口史上。

与此同时,不那么关心理论的学者也从政治和战争这些传统的历史主题转向关于商业、艺术、习俗和“风俗”的发展的社会史研究。比如说,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年)讨论的就是自查理曼时代以来的欧洲社会生活。……

此外,吉本的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既是政治史,也是社会史。该书有关匈奴和其他蛮族入侵者的章节强调“游牧民族”的一般特征,显露出他与弗格森和斯密的观点的一脉相承。对于吉本而言,这种从特殊中看到一般的洞察力正是他所谓的“哲理性”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特点。

一百年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不如启蒙运动时期那么对称了。历史学家不仅对社会理论敬而远之,而且也放弃了社会史。19世纪后期,西方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是兰克。他虽未率直地拒绝社会史,但他的著作多聚焦于国家。在兰克时代和其后的追随者时代——这些追随者们甚至比他们的首领更极端,正如通常的追随者一样——政治史又恢复了过去的支配地位。

这种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史的背离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其一,这一时期正值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将历史学看做一种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或正像持有异议的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民族主义宣传手段。……大学和学校的民族史教学促进了政治整合。因此很自然地,政府所推介的历史学就是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和政府的联系在德国尤其突出。

其二,历史学向政治回归具有学术上的原因。与兰克相连的历史学革命首先是史料和方法上的革命,是从利用已有的史书或“编年史”转向利用政府的官方档案。历史学家开始经常查阅档案,并制定出一系列越来越精巧的方法来评估这些档案的真实可靠性,因此他们声称他们的历史著作比前人更客观,更“科学”。这种新学术思路的传播与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有密切联系,当时历史学的第一批研究机构、专业期刊和大学科系相继创立。

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关注国家的兰克派历史学家的研究相比就显得不专业了。对于在实践中仍

然被当做残余领域来对待的东西,称之为“社会史”,也确实恰如其分。屈维廉对社会史下的著名定义是:“除政治以外的民众史”,这不过是将默认的看法变成了明确的表达。……政治史(至少在专业圈内)比社会、文化研究更实在、更严肃。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1874年)忽略战争和条约,专注于日常生活。据说他以前的导师 E. A. Freeman 是这样评价该书的:如果格林能完全抛弃那些“社会废渣”,他有能力写出一部出色的英国史。

这些偏见不是英国特有的。在德语世界,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后来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在刚出版时并非如此,这可能是因为该书建立在文字资料而非官方档案上。法国历史学家库朗日的名著《古代城市》(1860)主要关注古希腊和罗马的家庭。他坚持认为,历史学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即真正的社会学。他能得到专业同行的接纳,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例外。

简言之,兰克的历史学革命具有始料未及的极端重大影响。这种新的“文件”研究方法对于传统政治史研究特别管用。因此,19世纪历史学家在题材选择范围上越来越窄,甚至比他们18世纪的前人还老套。其中有些人拒绝社会史是因为它不能被“科学地”研究;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以相反的理由排斥社会学:因为它太科学、太抽象、太一般,以至于根本不考虑个人和事件的独特性。

这种对社会学的拒绝,在19世纪晚期一些哲学家,尤其是狄尔泰的著作中表达得最明确。狄尔泰既从事文化史,又从事哲学的写作。他宣称,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类似赫尔曼·艾宾浩斯的实验心理学)是伪科学,因为他们提供的是因果关系解释。他对科学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作了一个著名的区分:前者是从外面来解释,后者是从内部来理解;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使用的是因果关系词汇,而人文学科学者则用“经验”来谈。

克罗齐持类似的观点。他以一个哲学家而闻名于世。同时他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之一。1906年他拒绝一项在那不勒斯大学设社会学教职的呼吁,因为他认为社会学纯粹是伪科学。

从社会理论家方面来说,尽管他们仍不断研究历史,但对历史学家却越来越挑剔。托克维尔的《旧制

度与大革命》(1856)既是基于原始文献的历史学创新之作,又是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内的里程碑。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不论是对经济史还是对经济理论而言,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尽管《资本论》在19世纪并未引起历史学家多大注意,但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已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时代的历史研究。至于斯莫勒,他在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中坐头把交椅,更多地以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而闻名。

相对而言,像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斯莫勒这样把理论与对具体历史状况的细节的兴趣结合起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的。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一些新兴学科中,更普遍的则是对长时段趋势的思考,尤其是关注时人所称的社会“进化”。孔德相信,社会史——或他所谓的“没有个人名字,甚至没有民族名字的历史”——对于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他第一个将这种理论研究称之为“社会学”。他一生的主要成果可以被称为“历史哲学”,因为它原则上将过去划分为三个时代:宗教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科学时代,而“比较方法”——那个时代的另一个口号——则是历史方法,因为他将每个社会(每一种风俗和人为现象)置于进化阶梯之中。

进化规则模式将不同的学科连接在一起。经济学家们所讲述的是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法学家们——如梅因在《古代法》(1861)中——讨论的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民族学家们——如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和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2)中——把社会变迁展示成从“野蛮状态”(或曰人类“自然的”或“野性的”状态)向“文明”的进化;社会学家斯宾塞则运用从古埃及到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具体历史事例描绘了他所谓的从“军事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

进一步看,地理学家拉策尔和心理学家冯特对所谓“自然民族”作了极其相似的研究。拉策尔关注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冯特关注的是他们的集体心态;弗雷泽爵士的《金枝》(1890)的主题就像后来列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态》(1922)一样,是从巫术到宗教、从“原始人”到文明人的思想进化;尽管弗洛伊德强调“原始”因素在文明化的男人和女人心智中的残存,但他的《图腾与禁忌》(1913)和《幻想的前景》



(1927)表明,他是这种进化论传统的晚期代表,同时这些论文显示出弗雷泽思想的重大影响。

通常,进化被视为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但并非始终如此。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1887)就以怀旧情绪描绘了从传统的面对面的共同体向现代形同路人的社会的转变。该书只是一系列分析旧秩序消亡原因的著作中最明显地表达出怀旧情绪的一部。

理论家虽然对过去的态度比较严肃,但对历史学家却几乎没有半点尊重。例如,孔德就不屑一顾地谈到他所谓的“稚气地收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它们出自喜好毫无用处的趣闻轶事的编者,出自他们盲目的非理性的好奇”。斯宾塞则声称,社会学之于历史学,“正像大厦是从周围堆积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说得好听些,历史学家是为社会学家搜集原始素材;说得难听些,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毫不相干,因为前者甚至无法为建筑巨匠提供所需的素材。斯宾塞又称:“君主们的传记(舍此以外。孩子们别无所学)对社会科学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启示。”

只有那么几个历史学家“幸免于难”,其中最著名的有库朗日,他的古代城市研究已为人所知。还有英国法律史家梅特兰,他将社会结构看成是由权利和义务所规范的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其观点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有较大影响。

然而,20世纪早期,大多数社会理论家既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又摈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著述。其中相当一批人就是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古代世界历史学家,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如法国地理学家韦达·白兰士、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和苏格兰人类学家弗雷泽。……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三个社会学家——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在历史学领域都享有盛名。帕累托的《论普通社会学》(1916)深入研究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及罗马,并从中世纪意大利史中撷取例证;涂尔干则致力于通过将社会学从历史学、哲学和心理学中区分出来,为它勾勒出研究范围。他本人曾师从库朗日研究历史,并将他的一本专著献给后者。他还写过法国教育史的专题论文。他在他所主编的《社会学年

鉴》中坚持评述历史学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必须关注不像事件史那样“肤浅”的东西。

至于韦伯,他的历史学知识,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确实非凡出众的。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1904—1905年)之前,韦伯著有中世纪贸易和古罗马农业史方面的书。……韦伯既向历史学借用材料,又向历史学家讨教概念。如著名的“卡理斯玛”概念就源于一个教会史专家 Rudolf Sohm 关于早期教会“卡理斯玛式组织”的论述。韦伯所做的只是将这一概念世俗化,使之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实际上,韦伯是视自己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一个比较历史学家。

对历史的摈弃

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于1917年和1920年去世。出于各种原因,新一代社会理论家背离了过去。

经济学家们被吸引到两种不同的方向。法国的西米昂、奥地利的熊彼特和俄国的康德拉捷夫等经济学家通过收集历史统计数据来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周期。他们这种对过去的兴趣有时夹杂着一种斯宾塞式的对历史学家的轻视。如西米昂就曾抨击他所谓的历史学家部落所崇拜的三种“偶像”:政治、个人及编年史,摈斥他和另外一些人首先命名“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学”(事件史)……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背离过去,趋向于一种以纯数学为典范的“纯粹”经济理论。研究边际效用和经济平衡的理论家越来越无暇顾及斯莫勒及其学派所用的历史方法。一场著名的“方法之争”使这一行业分化为两种极端:历史主义者和纯理论家。

心理学家。如《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的作者皮亚杰和《格式塔心理学》(1929)的作者克勒虽然风格各异,但都转向不能适用于历史研究的实验方法。他们摈弃图书馆而代之以实验室。与之相似,社会人类学家对旅客、传教士和历史学家的文献不屑一顾,发现了在其他文化中进行“田野工作”的价值。……自马林诺夫斯基后,田野工作成为锻炼每个人类学家的必要阶段。

社会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一个转向现实——就像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学向现在的回归”——的生动例子是,1892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创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系。



它的首任系主任斯莫尔过去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帕克的支持下，芝加哥社会学家转向对当代社会尤其是对他们的城市的研究，如贫民窟、犹太人地区、移民、黑社会帮派、流浪汉等等。……调查研究成了美国社会学的主心骨，社会学家们得出自己的数据，并认为历史“基本上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毫无关系”。

对于这种牺牲历史转向现实研究的变化，或许可以作出几种不同的解释。社会学本身的重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而在美国（尤其是芝加哥），与欧洲相比，历史不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那么明显。也许，社会学家会争辩说，拒绝历史是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越来越自成体系和越来越专业化相关的。与历史学家一样，这些领域的学者当时纷纷创设他们各自的专业学会和期刊，与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分道扬镳，对于这些新学科形成学科认同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思想史家也许会强调一种学术趋向，即“功能主义”的兴起。在 18 和 19 世纪，对风俗和社会体制的解释通常使用历史学术语，诸如“扩散”、“模仿”和“进化”等概念。这种历史研究有许多是思辨性的或“猜测性”的。那么，别的可行之道是什么呢？

• 受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启发所找到的另外的可行之道是，用它们在现实中的社会功能，用各种因素对维系整体结构所起的作用来解释风俗和体制。根据有关物质世界或人体的模型，社会被构想成一个平衡的体系（帕累托最爱用的术语）。在人类学领域，这种功能主义立场被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所采纳，后者并视历史这一“死亡的被埋葬的东西”如敝屣，认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运行毫不相关。很难说是田野工作的兴起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者的习语，人们就会说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适应”。遗憾的是，它们强化了社会理论家不关心历史的倾向。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或数理经济学的巨大学术成就。这些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在它们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些进展也是针对早先理论和方法确实存在的缺点。例如在研究部落社会时，与先前的思辨性的进化历史研究相比，田野工作提供了远为可靠的事

实基础。

然而……所有这些进展——就像以兰克为代表的那种历史研究一样——也自有其代价。新兰克派历史学家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在方法上比前人更严格，但他们的视野也更为狭窄。他们忽略，甚至有意省略那些某种程度上与他们新专业标准不相容以至于无法处理的东西。但是，或早或迟地，注定会出现心理分析家所说的“压抑反弹”。

社会史的兴起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过去渐渐失去兴趣的同时，历史学家却开始创造某些东西，似乎在回应斯宾塞提倡“社会的自然史”的呼吁。19 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新兰克学派越来越不满。兰普雷希特是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他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这里所说的其他学科包括冯特的社会心理学、拉策尔的“人文地理学”，他们都是兰普雷希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同事。兰普雷希特以特有的大胆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他将这种社会—心理研究思路应用于他的多卷本《德国史》（1891—1909 年）中。该书在涂尔干的《社会学年鉴》上备受赞赏。……

然而，后来被称为“兰普雷希特争论”之所以那么激烈，他的真正“罪过”在于对兰克学派或新兰克正统学派提出质疑。……1900 年前后，绝大部分德国历史学家还没有想过超越兰克。在韦伯从事他著名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时，他成功地从寥寥无几的、同样对类似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同事那里汲取了营养。然而或许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中的中坚分子桑巴特和特勒尔奇分别在经济学界和神论界而非史学界享有盛誉。

兰普雷希特想要打破政治史垄断地位的努力失败了。但在美国和法国，振兴社会历史学的运动却得到了更有力的响应。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起了一场与兰普雷希特类似的反对传统历史研究的进攻。他写道，“必须全方位地考虑人的活动”，而“单个与其他侧面孤立开来的社会生活侧面是无法被理解的”。与兰普雷希特一样，特纳也看重拉策尔的历史地理学。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虽然引来争论，却不失为对美国体制的一个



划时代的新阐释,他把它们看成是对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回应。……与特纳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鲁宾逊是另一个提倡他所谓的“新史学”的雄辩宣传者。这种新史学关注所有的人类活动,并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里汲取思想。

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布洛克和费弗尔发起了一场旨在倡导“新型历史研究”的运动。他们创立的期刊《社会经济史年鉴》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历史学家……他们的目标是用一种他们所说的“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来代替传统的政治史。从此,“结构”一词成为被称为“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最常用词之一。

尽管费弗尔和布洛克志趣不尽相同,但两人都希望历史学家向毗邻学科学习。两人都对语言学兴趣盎然,也都了解哲学与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取得的“原始心态”研究成果。不同的是,费弗尔对地理学和心理学尤感兴趣;至于心理学理论,费弗尔倾向于他的朋友布罗代尔而拒绝接受弗洛伊德;他在钻研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的同时扬弃后者的决定论,并倾向于法国杰出的地理学家韦达·白兰士的“可能论”方法,该方法强调环境使人能够做什么而不是环境对人的限制。布洛克则更接近涂尔干的社会学及其学派(尤其是其中的哈布瓦赫,他是一项著名的社会记忆框架研究的作者)。他也像涂尔干一样关注社会内聚力和集体表象,也致力于比较方法。

1944年,布洛克被德国行刑队枪杀,但费弗尔却侥幸熬过二战并成为法国历史学界的权威。实际上,作为重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他不仅成功地推动了学科间的协作,而且使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赢得了首席地位。费弗尔的政策被他的后继者布罗代尔所继承。布罗代尔不仅是被盛赞为20世纪最重要史学成就的史学著作的作者,而且还是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饱学之士,同时,他还是社会科学共同市场的坚定倡导者。他坚信,历史学和社会学尤其应该相互接近,因为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努力或应该努力将人类经验视为一个整体。

……

理论和历史学的会聚

几个例子就能说明,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间

从来没有彻底断绝联系。1919年,荷兰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出版了研究14、15世纪文化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其中就借用了社会人类学家的观点。1929年,新创刊的杂志《社会经济史年鉴》编辑部中,与历史学家一道的还有政治地理学家西格弗里德以及社会学家哈布瓦赫。1939年,经济学家熊彼特推出他的具有历史感的商业循环周期研究成果;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亦出版了被公认为经典之作的《文明的进程》。1949年,终生倡导人类学和历史学紧密关联的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发表了一部关于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团信徒的历史。

到60年代,涓滴之水汇成了著作溪流。诸如艾森斯塔德的《帝国政治体系》(1963年)、李普塞特的《第一个新国家》(1963)、梯利的《旺代》(1964)、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以及埃里克·沃尔夫的《农民战争》(1969)……所有这些都表达并加深了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有共同目的的认识。

过去20年中,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类学家,著名的有格尔兹和萨林斯,都在研究中重视历史的向度。一批英国社会学家,著名的有盖尔纳、约翰·霍尔和迈克尔·曼实现了18世纪追求“哲理性历史”的设想,循着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研究世界历史的传统,旨在“区分不同的社会类型并阐释它们之间的转变”。类似的还有埃里克·沃尔夫研究自1500年以来欧洲与其他地区关系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历史经济学”(远不及前三者出现频繁)等术语用来描述历史学被运用到这些学科以及后者被应用到历史学这两种现象。这种向同一学术领域的汇聚有时也引起边界争端(如历史地理学应在哪儿结束?社会史研究应从哪儿开始?),有时也会将不同的术语糅在一起来解释同一现象。但这种汇聚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共同的研究领域里利用不同的方法和观点。

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日渐密切,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变迁必然引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最初做田野工作的地区,考察这些地区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发生的变化)。那些研究世界人口爆炸的人



口学家、那些研究所谓“欠发达”国家农业及工业发展条件的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实际是以时间为序列的变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法国人口学家路易·亨利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试图将他们的研究延伸到更遥远的过去。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由传统政治史(描述统治者的作为和政策)向社会史的巨大转移。……为了在急剧变动时期确定他们的位置,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寻根,以恢复他们与过去,尤其是与他们各自群体过去的联系,这种群体包括他们的家庭、城镇和村庄、职业以及他们的族裔或宗教团体。

我认为,一些社会历史学家的“理论转向”和一些理论家的“历史转向”应大受欢迎。培根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同时辛辣地讽刺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和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理论家。相反,培根推崇既采集原料又进行加工的蜜蜂。……没有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

……过去几年中,有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好像是平行铁轨上的两列火车擦肩而过,而不是向一点汇聚。例如,在历史学家挖掘功能性解释时,人类学家却已经开始对它兴味索然。反之,当人类学家正视事件的重要性时,许多历史学家却已经摒弃“事件史学”而转向研究隐含的结构。

更复杂的是,多种理论前所未有地争奇斗艳。例如,社会史研究者不可能只将注意力局限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他们至少还需要考虑与他们的研究相关的其他理论的可行性。地理学这一古老盟友近些年来变化很大,历史学家从这一学科中可以借鉴中心区位理论或关于革新的空间传播理论或“社会空间”理论。现在,文艺理论在影响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同时也影响了历史学家,以致所有的人都愈加意识到,他们作品中存在着文字表达模式,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亦步亦趋。

我们正处在一个界限模糊、学术前沿开放的时代,一个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令人困惑的时代。不但在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的著作中,而且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参

考了巴赫金、布尔迪厄、布罗代尔、埃利亚斯、福柯和吉尔兹的研究成果。而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一种共同话语的增加,恰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实际上也是在每一个学科内共同话语的减少同时发生。甚至诸如社会史研究之类的分支学科现在也面临着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的危险,一方关注大趋势,另一方注重小规模的研究。尤其在德国,两方正处于冲突之中,一方是所谓的“社会的历史学家”(societal historians),另一方是“微观历史”的实践者。

……

曼达利奥:历史社会学

导语:

曼达利奥的《历史社会学》(John Mandaliolis, Historical Sociology, 李康、姚映然译,收于布赖恩·特纳主编《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503页)初版于1996年,总括了历史社会学的总体发展趋势,重点结合吉登斯、埃利亚斯、沃勒斯坦、罗伯逊、迈克尔·曼等人的著作,介绍了作者眼里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有助于了解美国式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著作,以及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的范式演变,并通过全球化理论的讨论串联到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网络研究等领域的关联和最新进展(2000年再版时加入了后面这些内容)。从挑战支撑着自由派现代化观念的假设,到立足发现它者、宽容对话的文明分析,此文不仅有助于思考发展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关联,更有助于理解历史性社会研究在当下世界深刻的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

类似概述性的中文译著可参考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教科书式学术史总结。可以看出,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推动和冲击下,既要维持学科品格又要应对时代情境的历史性社会研究要想真正摆脱宏观比较、制度取向的历史社会学风格局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康)



原文：

经典的社会理论家维柯、马克思、韦伯都十分透彻地把握到了“历史范畴”与“社会范畴”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是到了实证主义科学开始占据主宰地位之后，社会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这种亲和才突然显得很成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历史社会学一直非常薄弱……在现代大学中，无数学科界限和分支学科的专门化使得人的科学四分五裂，这使得历史社会学看上去颇有些“总揽全局”的味道。像今天的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一样，历史社会学已经超越了主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哲学家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后的观察家们在建构理论来全面理解变迁的主要根源或现代性的各项制度时，再也不能不涉足社会发展与不连续性方面的理论了。跨学科研究使从事比较研究和有历史倾向的社会理论家们能够更充分地追问当代规范、自我理解与行为模式中的历史偶变性特征。……在20世纪的一些学者的作品里，出现了倡导用跨学科视角来研究理论、文化与社会的主张，这些学者中有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福柯、哈贝马斯、埃利亚斯、吉登斯、迈克尔·曼、罗伯逊和尼尔森。

以下几位理论家的详尽研究清楚地表明，那种认为历史学而非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诸社会的研究，这种研究强调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彼此所历经的变迁”(Burke, 1980: 13)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些理论家包括：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1963)，摩尔(Moore, 1969)，佩里·安德森(Anderson, 1974a; 1974b)，蒂利(Tilly, 1975)，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1989)，布迪厄(Bourdieu, 1984)和埃利亚斯(Elias, 1939)。无论是经典社会理论，还是现代社会理论，都一直表现出敏锐的历史意识感……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社会学只不过是涓涓“细流”，到80年代被称为“潮流”(Burke, 1980: 28)，而在今天已经变成十足的湍流了。除了斯梅尔塞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Smelser, 1959)，贝拉的《德川宗教》(Bellah, 1957)，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制》(Eisenstadt, 1963)，蒂利的《论旺代》(Tilly, 1964)，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Elias, 1939 初版)和福柯的《疯癫与文明》(Foucault, 1965)以外，最近其他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也

被归到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中来。其中包括：佩里·安德森的经典研究《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Anderson, 1974a; 1974b)，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Wallerstein, 1974—1989)，斯考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kocpol, 1979)、《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Skocpol, ed., 1984)，本迪克斯的《国王还是人民》(Bendix, 1978)，蒂利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Tilly, 1984)和《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Tilly, 1990)，吉登斯的两卷本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Giddens, 1981; 1985)，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Mann, 1986; 1993)，盖尔纳的《犁、剑、书》(Gellner, 1988)，以及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Elias, 1978; 1982)。

这些作品具有一致性的核心观点：要对当代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模式提出恰当的追问，就不能脱离历史的视角。我所谓“历史的”不仅仅是停滞不变的过去：事件、纪念日、朝代、国族发展里程碑；它还代表更多丰富的内容。与自然主义恰好相反，历史的理解能够使个体对特定的具体实践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性有所反思。……事物本身的秩序会随时间(历史局势)与场所(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对社会世界以及所进行的考察选取一种更具反思性的位置。自我反思与历史意识可以说是同步发展的。

……要设想未来的事情会有什么不同，就必须理解我们是如何到达目前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立足点的。尽管当代大多数社会理论都拒斥目的论式的历史哲学，但仍然在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世界或我们的自我的观念理解是以何种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而，为什么它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变化？对此，有一种观点咄咄逼人地宣称，随着意识形态的消失，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出现了“历史的终结”，以及“最后的人”的到来(Fukuyama, 1992)。

……绝大多数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家……看来，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到来仅仅是向现代性突破的潮流之一。他们更愿意去强调工业化(盖尔纳，贝克)、资本主义(布罗代尔，吉登斯)、革命性政治活动(斯考科波尔)、国家形成(埃利亚斯，迈克尔·



曼)、社会宗教制度(艾森斯塔德)、黥武政策(J. 霍尔, 蒂利)以及禁欲的理性主义(阿多诺、尼尔森)对于人类处境的有关影响。

对于这种里程碑式转变的准确性质,争论的焦点主要是那些认为现代化(现代科学、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具有进步性的现代自由主义假设具有多少效验。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界和政治军事圈子里,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地位显赫。有鉴于此,其后涌现出的大多数作品大多表现为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双重批判形式,一方面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Anderson, 1974a, 1974b; Giddens, 1981; Mann, 1984, 1986),另一方面则批判立足于亚当·斯密学说的现代化理论(Frank, 1967; Wallerstein, 1974—1989: 卷一)。因而,当引导19世纪如斯宾塞和马克思等自信的观察家的那种传统思路彻底受到质疑时,具有丰富历史意涵的社会理论就开始了复兴之途。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黑格尔左派或右派的单线进化论失去权威地位有关。

因此,就像今天的文化科学,大多数的历史社会学都渗透着对于政治范畴的一种特定的敏感,而在有关国家—市民社会复合体的分析中,则充斥着针对支配、授权、解放和不平等问题。这种趋向绝非偶然。福柯对关键性的纪律控制制度,如监狱(Foucault, 1977)、收容所(Foucault, 1965)和诊所(Foucault, 1973),进行了一系列深度历史研究,而这还只是文明分析——即对文明形式与认同结构的考察中体现社会理论与权力之相互交织的一个晚近范例。至于文明分析的先行范例,则可回溯到20世纪70—80年代到来的“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以前。先是出现了施本格勒的研究《西方的没落》(Spengler, 1926—1928),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Weber, 1920—1921)中有关世界宗教与西方理性的文明分析,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Freud, 1930),在此之后,欧洲大陆上产生了两部从超国家视角出发研究权力与历史的重要作品。这两部作品,即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均强烈主张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生活,而不是照例仅从现代民族国家入手。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文明(或多种文明)的这些研究,一起成为历史社会学黄金时代发展

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进一步推动人们从一种特有的长时段文明视角来研究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形式。……

一般认为,对“现代化”的自由派理论(Rostow, 1960)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一种颇有几分马克思主义意味的批判,这种批判开创了世界经济体与核心社会—边缘社会研究。在沃勒斯坦著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研究出现以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已经开始考察物质生活和文明与地理和权力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各个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文明的不均衡发展,布罗代尔的分析范围就必须超出传统的民族史学的界限。他的全局史(histoire globale)可以看做是文明分析与全球性社会学的先驱。在他那里,对于社会的等级制度、国家、文明和城市的考察,都是在以局势史(histoire conjoncturelle)(历时的)与结构史(histoire structurale)(静态的)为焦点的框架中建立起来。……

……沃勒斯坦的理论旨趣最初在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它们对北方发达国家财富和权力中心即所谓大都市的新殖民依附。他后来的工作集中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大量得益于依附理论家的奠基性工作,尤其是巴兰(Barran, 1957)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Frank, 1967, 1969)两人的著作。关注非西方国家欠发展的发展,这一主题大大推动了历史社会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而作为国际社会学的先驱,研究第三世界欠发展状况与帝国主义的社会学也勾勒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域,人们现在普遍称之为全球化。在后一个问题域下,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等方面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形式中,“没有历史的人民”的观念里体现出的那种殖民主义思想支配地位遭到了猛烈抨击。

……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主张是:考察任何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性质,都必须基于该现象与给定的社会“总体”的关系加以理解和说明。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理解民族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空间关系所形成的复杂型构中彼此相互作用的。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领域之外,来解释不同群体与个人的行动、



价值观念乃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就会犯 19 世纪实证社会学的错误,那种社会学天真地信仰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

在英国历史社会学中,社会的互赖性问题先于全球化理论的兴起而成为研究的主题。其入手角度主要是地缘政治学的时空维度,以及迈克尔·曼(Mann,1986)所谓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权力来源”。这一“学派”独特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明确关注民族主义(Smith,1981;Gellner,1983),国家政权建设(Anderson,1974b;Hall,1986),强制(Giddens,1985),以及此前被忽视的权力与联盟的跨社会网络等政治现象(Giddens,1981;Mann,1984;Hall,1985)。……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单线进化论进行了双重批判,和迈克尔·曼的立场不无类似,都明确地拒弃有关社会变迁的一元因果解释,以及各种抱守社会发展与道德发展均遵循单一持续路线的神话的历史哲学。……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与此前一切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通过向充满活力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过渡,权力资源(即权力的容器)发生了空前的飞跃。他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被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相互交叉作用所形塑”。然而,他却又步福柯之后尘,界定了另外一种权威性的权力来源:集约性社会控制。这给现代性添加了新的权力容器,体现在被认为用来界定现代性的以下四种“制度丛结”中:“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的不断巩固”(Giddens,1985:5)。……

……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设定了“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具体结构化过程”,其入手点是考察个体与社会两方面如何将它们自己定位于一个全球域(global field)中,而这个全球域将同时规定并重新表述它们各自基于特殊主义而产生的利益及认同(Robertson,1992:5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同于全球主义(globalism)之处,就在于它表达了这种被视为超民族或超社会的结构化现象的过程性质。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它既非“国际主义”(支撑各种国际团体的统一体),也不同于“世界社会”,因为这种理论并不努力辩称世界大同的公民社会的正当性甚或其存在的实际

可能。

正相反,这一理论是通过两种(几乎)对立的逻辑或“倾向”加以限定的。其一是“趋向同质性和普遍主义”,其二为趋向“异质性与特殊主义”(Robertson,1989:63)。前者关注“现代世界的‘系统性’和人类的整体性”的新凸显的感受,而后者“核心是概括出文明与社会的独特性的价值”(Robertson,1989:63)。以下表述可以展现出这二者的互相依赖:“全球的与地方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正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我们或许应该讨论生活世界的全球制度化 and 全球性的地方化”(Robertson,1992:52—53)。

……正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理解当代生活的关键,而利奥塔或布希亚认为后现代性是理解当代生活的关键,对于罗伯逊而言,全球的形势或位置则是理解当代生活的关键。……由于全球化不仅早于后现代性的到来,而且早于“漫长的 16 世纪”的现代性,它便具备了世界历史先驱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理论的构造框架以一种颇具还原论色彩的立场,将我们引向具体的实例:后现代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现代化都转变为全球化进程的诸多具体体现。

……全球化理论也寻求将“文明带回到”社会变迁的图景中来,以此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理论,并且主张,宗教性的意义来源的复兴以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全球人类处境的核心内容。事实上,罗伯逊十分关注作为社会变迁的关键原因的“文化”,这种关注超越了现代国家体系的政治—战略逻辑,从而有可能考虑这样的观念:文明“作为一种合法观念”,与基于“近乎全球的基础”的那种“主导性全球化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根本形式”息息相关。

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特色,就是欧洲国家形成与宫廷理性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观念以及各种形式的礼貌。……把各种社会形式〔管制机器的社会生成(sociogenesis)〕和人类主体性的转型〔个体自我约束的心理生成(psychogenesis)〕这两方面的分析融合在一起。这是国家形成与认同形成之间一次非同寻常的联姻。……

埃利亚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区分与社会互动中暴力的根除孕育了人类情感结构的转型。伴随着早期现代欧洲骑士的衰亡与贵族阶层的兴起,符合宫廷礼节的行为形式迫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根本



的转换:个人情感与冲动的节制。不管怎么说,正如弗洛伊德早先提出的主张一样,一种更为严厉的心理节制会使人们更有能力进行社会合作、预见、工具性的计算,以及发展出日益精细的符号。……

……尼尔森关于文明的历史社会学超越了韦伯的世界历史比较,着力发掘文化形态的多重层面,翻寻种种它者的、“异在的”文明踪迹。因此,韦伯是站在欧洲独特性的立场上,来考察非西方的城市、宗教、科学、财富和政治的形式,而尼尔森则不仅致力于比较牛顿式的科学与中国的经验科学之间的相对差异,而且还比较了文明之间的遭遇对其各自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相对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想说明某一种文明的上升,就既要研究某个文明复合体(civilizational complex)的历史构成,也要考察它与其他部落、帝国或国家之间的遭遇或交流。……

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即卡沃利斯(kavolis,1985)所称的“研究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其任务即在于阐明关于自我与(多个)“世界”的文化理解的解释学维度。如果忽略考察所探讨的实际主体或文化群体的符号架构和解释图式,我们就有可能将自己对于世界、社会秩序和“好社会”的观念强加给他人。换言之,如果没有注意到,主体自身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体察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把构成符号行为的意义赋予该行为,那么,现代化将会成为暗中为害的标准化逻辑的先兆。……如果我们在理解这种由“现代化”刺激造成的巨大变迁时,忽视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就有将现代化简单归为西方化的风险。罗伯逊的全球性观念旨在强调在全球地方化概念(glocalization)中所体现出来的,“地方的”与跨国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力量之间的相互渗透,以此彻底克服上述这种归并的谬误。这是一种相当正确的宗旨。对于我们来说,不再可以用19世纪的术语来思考,是该选择做一个“同质化因素”还是“异质化因素”,这原本就是个虚假的两难,却在后现代反基础主义面目之下得到了重新表述。而全球性则就此使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成为哲学角度上的冗余。

产生同质性趋势的因素,不仅有资本积累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全球过程(即帝国主义),而且还包括关于欧罗巴帝国征服的理性阐释效力的种族中心主义元理论假设。而在更为晚近的时候,学术界中后殖民主

义的介入则进一步推动了遏制这种趋势的斗争。萨伊德批判了18、19世纪的东方学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Said,1978),而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和普拉卡什最初正是受到这种批判的激发,现在则从一种独特的文学视角入手,成为对臣属(subaltern)处境进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阐释者。……

学者们认为,西方眼光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对有关非欧洲生活方式的人类学考察与历史考察施加一种认识论,不过这种认识论未必是限制性的。而在现实当中,这些生活方式是杂多的而非一致的,混合的而非单一的,偶变的而非固定的(Spivak,1990;Bhabha,1994)。后殖民主义者倡扬的是前三项特征而非后三项特征,力图拆解一些有害的二元对立,它们标志着历史、比较文学、政治科学和女性研究等“学科性知识”的特征,包括文明与野蛮、内部与外部、自由与奴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同一性与它者性、先进与落后、认识论上的确定性与虚无主义的唯我论以及在场与不在场。……论证主张上的总体转换是从空间性转向时间性(Featherstone and Lash,1995),同时也从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转向跨学科的、反基础主义的、铭刻性的“书写差异”方式,以对抗那种一般会抹去多重“文化位置”的概念霸权(Bhabha,1994)。……

……历史社会学的宗旨不是要玩哲学家的真理游戏,而是要找出那些决定意义与行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特定因素。它由此便可以更好地把握知识分子所参与的那些意义框架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从而有可能将她或他以及当前的争论定位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中,即去殖民化、多元文化以及在全球化状况下西方女性主义的相对缺陷等方面所产生的效应。……

福柯:无名者的生活

导语:

福柯(Michel Foucault)从撰写《癫狂与文明》开始,一直参与整理总医院和巴士底狱中的监禁者的档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利用这些材料,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集。《无名者的生活》(The Life of Infamous Men,李猛译,王倪校)就是福柯为其中一本撰写的导言。最初在1977年1月发表于Les Cahiers du chemin(第29号)。



中译完成于6年前,曾刊于《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历史社会学”专题。

这篇选文乃是作为众多新社会文化史或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历史性社会研究之“经典”、“方法论”的代表,然而它恰恰是在拆毁“经典”和“方法论”的“纪念碑”。本文隐秘地通向无数的理论思考和经验研究,彰显它们自觉而为的优点,或许也暴露它们自以为是的破绽。

我们开始重视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但我们如何才能“触及”日常生活?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本身与权力的延伸或巩固之间,是否正存在着隐秘的关系?权力在怎样的意义上是一种在遭遇中生成的关系?历史性的社会研究如何可以是一种诗学?一种反诗学的诗学?“难道真有什么别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

可参考福柯“尼采、谱系学与历史”、“治理术”及《规训与惩罚》等其他“历史”著作,乃至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选文约原文篇幅三分之一,本身也可谓我删减留下的残迹串联而成的一种效果。

(李康)

原文:

这本书,从哪方面来看,都不是一本历史书。挑选哪些文本组成这本书,着重的是我自己的口味,我的快乐,一种激情、笑声、震惊,某种恐怖或者其他情感,这些情感如此强烈地保持下来,也许到今天我也很难有理由说,发现它们时的最初激动已经逝去了。

这是一本生存的选集。其中包含的生活,只有寥寥数行,或者短短几页,无数苦难,重重艰辛,却凝聚在片语只言中。短促的生活,只是出于偶然才有机会留在书本或文献中。……正是因为在这些文本中讲述的诸多事情都浓缩在短短的文字中,人们才不知道贯穿这些生活的力量究竟是来自栩栩如生的词语,还是在这些文字周围碰撞的那些暴烈的事实。这些独特的生活,历经了一些我弄不清楚的偶然事件,变成了一些奇异的诗,因此我才将这些文本以一种标本图谱的方式汇集在一起。

……我承认,这些“故事”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沉默,突然冒出来,要比那些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更能触动我的弦,而我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出,那些打动我的究竟是这种古典风格的美(只寥寥几句就展现

了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悲惨生活),还是这些生命中的过度(excess)。这种过度,混杂着朴素的顽固与凶恶,人们可以在那些打磨得像石头一样的文字中,感受到摧毁与顽强。

……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在那些毁灭它们的简短文字中被化成了残骸灰烬。当我碰到这些文字时,我感到震动。……要把握这些文字的贫乏枯燥;我努力探寻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涉及了哪些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如此热切地防止贫乏的精神步入那些无人知晓的道路。但是,那些最初推动我的热情依旧没有被触及。而既然不能把它们纳入到理性的秩序中,既然我的话语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它们,就让它们保持我最初经历它们的样子,难道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在出版这些文本时,进行系统有序的编排,给出一些初步的解释,哪怕只让这些文本展现一种最低限度的历史意涵。鉴于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原因,我放弃了这种想法;我决定只是简单地汇编一批文本,标准就是在我看来它具有多大的强度;每篇文本,我加上一些基本情况的说明;而我安排这些文本的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遗憾最少的方式)就是保持每篇文本的效果。我的局限迫使我仅限于展现选文中简约的抒情。

因此,这本书不会令历史学家满意,更不用说其他人了。难道这本书是一本纯属主观的任性之作?我宁愿称这本书为一本平常之作或游戏之作,只是多少有一些自成一体的怪癖。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回事儿。但事实上,我相信,那位异想天开的高利贷者或是同性恋教士的诗,自始至终,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板。正是为了重新发现像这样闪耀着光芒的生存状态,像这样的“生活的诗”(life-poem),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些简单的规则:

- 应该考虑的确是有人人的故事;
- 他们的生存状态应该既模糊不清,又充满不幸。
- 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篇幅要尽可能短,只有几页,几行就更好了。
- 这些叙述不仅仅构成了奇闻轶事,而且以某种方式(因为这些讲述是申诉、告发、命令或者报告)还真的在他们的生存、不幸、狂热和难以确定的疯狂所



构成的微不足道的历史中发挥了作用。

●在他们的言语和生活所产生的震撼中,应该再次带给我们一种夹杂着美与恐怖的效果。

……除了人物的名字之外,这些简短的故事经常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他的东西,而这些短促的描述可能充斥着错误、捏造、不公正、夸大其词的地方,但在它们背后,总是有过一些人,他们活过,然后又死去,历经了苦难、邪恶、猜忌与喧哗。……这些文本总是应该与现实保持一种关系,或者说是无数种可能的关系:这些文本不仅涉及了现实,而且它们就在现实中发挥了作用;它们应该在真实故事的戏剧场景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它们应该成为施加报复的工具,解决仇恨的武器,一场战斗中的插曲,能够表达绝望、猜忌、哀求或命令的手势。组成这本书的并不是那些最忠实于现实的文本,如果那样做,就是从文本再现现实的价值来进行选择了……无论这些文本多么不准确、浮夸或虚伪,文本本身也渗透着真实的生活:话语的这些碎片拖着它们参与的现实的碎片。人们在本书中将要读到的并不是一些人物肖像的汇编,这里收集的文本是圈套、武器、叫喊、姿势、态度、计策或阴谋,而在其中,词就是工具。真实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演出”……

我也希望书中的人物本身不引人注目;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这些人应该置身于不幸之中,无论是爱还是恨,都满怀激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视为值得记录的事情之外,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在同辈人的眼中,或者比起他们平庸无奇的生活,这些都赋予他们以某种辉煌,震慑心灵或者令人怜悯。……

不过,我们要想有机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也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

只言。权力埋伏在那里,守候着这些生命,监视着它们,追踪它们,权力也会关注它们的抱怨和小打小闹,哪怕只是偶尔;权力的爪牙还会袭击它们,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权力的烙印。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或是因为有人自己向权力呈言,用这些文字来告发、申诉、恳请或哀求;或是因为权力想要干预,然后用寥寥数语来裁决或者宣判。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本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所预设的滔滔雄辩、出于战术考虑产生的片面之词或者奉命编造的谎言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

……如果这些生命不曾有一刻与权力相撞击,激发它们的力量,除了这些处于暴力或独特的不幸之中的生命,难道真有什么别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毕竟,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生命最热烈的点,能量积聚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们与权力冲撞的地方,与权力斗争,努力利用权力的力量,或者力图逃避权力的陷阱。在权力与那些最平凡无奇的生存之间往来的这些片纸只言,对于后者来说,无疑就是曾经给它们树立的唯一的纪念碑;这些文字正是投射到这些生命上的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短促光芒,它穿越时间,甚至使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些生命。

简单地说,我想要将一些残迹收集在一起,创造一部描述这些面目不清的人的传奇,它的基础就是身处不幸或盛怒中的人们与权力交换的这些文字。

我之所以称它们是“传奇”,是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和所有的传奇一样;既可以说是虚构的,也可以说是真实的。不过模棱两可的原因和通常的传奇正好相反。……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已经只剩下了那些对他们所做的简短描述:除了几句话之外,没有保留下任何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做过什么事。在这些文字中,正是稀少(rarity),而非冗长,使真假无关紧要。……他们仅仅留下了在这些言辞中的生存形式,这将这些不幸之人或恶棍流氓变



成了一些半虚构的存在。这些人甚至几乎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不知幸或不幸,出于巧合,这些文献被重新发现,从而使这些谈及他们或他们谈及自身的片语只言留存下来。一部黑暗的传奇,但更是一部贫乏的传奇,保留到我们今天的事只剩一个人某日的言谈,或者一次不期而遇。

这部黑暗的传奇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它的流传方式与那些装点着根深蒂固的必然性,历经了连绵不绝的路径的故事不同。就其本性而言,它没有传统,只是通过一系列断裂、漫漶、遗漏、交叉和重现,这部传奇才到了我们手上。从一开始,它就和偶然的际遇联系在一起。最初,一定是许多机缘凑巧,才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权力的目光,及其爆发出来的愤慨,落在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个人身上,关注他平庸无奇的生活,以及最终看来不过尔尔的缺点。……而且,在无数散失的文件中,是这份而不是其他许多文件,到了我们手中,被我们重新发现和阅读。因此,在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们与我们这些和他们一样无足轻重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的关系。没有任何东西一定使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突然从阴影中现身出来,带着他们的生活与不幸。……使这些绝对毫无荣耀可言的人们突然从如此众多的死亡中现身出来的偶然际遇,也使他们能够再次亮出他们的姿势,依旧展现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苦恼或他们不可压制的固执的散漫,这些也许补偿了他们为权力的耀眼光芒所照射(尽管他们平庸无奇、无名无誉)而带来的不幸。

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而我想要在这本书中收集的就是这些无名者稀少的残迹。有一种假的无名誉(infamy),Gilles de Rais,Guillieri 或 Cartouche, Sade 和 Lacenaire 这些恐怖形象或恶棍就享有这样的名声。表面上他们是无名誉,但正是因为他们身后留下了令人憎恶的回忆,人们相信他们犯下了无数恶行,引发了叹为观止的恐怖,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光辉的传奇的主人公,哪怕他们名声的来由与本应造就一个人辉煌形象的事情正好相反。他们的无名誉,只不过是一种普遍性的名望(fama)的某种样态。但是,那个背教的教士,那个迷

失在无人知晓的道路上的贫乏的精神,这些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名者;在今天,他们只是借助那些旨在将他们贬得一钱不值的几句可怖言辞,才得以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他们重返了这个真实的现在,而方式与他们原来被逐出这个世界的方式凑巧一样。要寻求他们的另一幅面貌,或者在他们身上臆测出另一种辉煌,毫无用处;他们只不过就是那些希望毁掉他们的力量留下的简短言辞:不多也不少。这就是严格意义的无名,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

……我怀疑在这些文本中存在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这里,政治机制与话语效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这些 17—18 世纪的文本,是一道光芒,特别是如果你将它们与后来的警察或行政管理方面那些陈词滥调相比;借助一个句子,它们能够展现一种辉煌,一种暴力,而至少在我们的眼中,这种辉煌或暴力,与这些事情的微不足道或者不够光彩的猥琐意图,大相径庭。在这些文本中,用来描述最可怜的生命的那些措辞,充满了诅咒或夸张的表达,看上去倒更适合描述最具悲剧性的生活。无疑,这具有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当一个文本在语言上无所不用其极,而采用这些词语只是为了让经天纬地的君主,关注无关紧要的乱子或是如此平庸无奇的不幸……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反差,在这些文本的词句中还是划过一道闪电,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权力的决策;而且如果说这些决策的庄重不是从它们惩罚的对象的重要性那里获得权威,也至少因为它们强加责罚时是公事公办的。……古典时代的权力话语,是对权力陈辞的话语,它造出了恶魔。为什么这部日常生活的戏剧会如此浮夸?

基督教就曾主要围绕告白安排把握生活平凡之处的权力:有义务用语言来剖析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世界、平庸无奇的过错、甚至觉察不到的毛病,一直追到你紊乱不清的思想、意图和欲望……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方世界发明了这种令人震惊的约束,它强加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他们说出一切,以便抹消一切,以一种不间断的,孤注一掷,穷根究底,巨细靡遗的低语来表述那些最微小的过失,但这种行动本身却在表述的那一刻就寿终正寝了。对于许多世纪以来的千百万人来说,过错必须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告白,用一种

稍纵即逝,但却出于义务的悄声低语。

然后,大概从17世纪末的一个时刻开始,这一机制为另一种运作方式不同的机制所包围,后者压倒了前者。这是一种行政管理机制,而不再是一种宗教安排:一种记录(registration)的机制,而不再是一种请求宽恕的机制。不过,针对的目标却没什么两样。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将日常生活纳入话语之中,调查那些无关紧要的违规活动和乱子的微末世界。但在这里,坦白不再扮演基督教曾经给它保留的显赫角色。因为这种古老的框架,以前一直是以局部化的方式运用的程序,从这时起却将被系统地予以利用:告发、检举、查问、报告、使用探子、审讯。而一切以这种方式说出的东西,都将被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积累,并构成卷宗和档案。忏悔坦白时单独的声音,即生即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抹消自身的同时也抹消了越界;而接续这种独白的是多重的声音,这些声音将自身储存在巨大的档案堆中,并借助这种方式持久地确立下来,成为无休止地增长的记忆,记住了世界上所有的过错。不幸和不轨的微小过失不再借助坦白中几乎难以听见的隐秘倾吐上达天听;而是在地上,借助书写的痕迹积累下来。这就在权力、话语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一种颇为不同的管制日常生活,阐述日常生活的方式。这样就诞生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新的“演出”。

……监禁王印文书的系统……并非确保王室的恣意能够在生活中最具日常色彩的部分以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相反,它确保这种权力沿着复杂的环路,在要求与回应这一整套游戏中得以分布。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滥权?也许是;不过不是指君主单纯滥用他自己的权力,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巨大的君主权力,为自己所用,满足他们自己的目标。反对他人,这是一种对君权机制,一种既定的可能性的处置方式: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懂得采用它,让它的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掌握它。这就产生了一些后果:政治的君权转而将自身安置在社会肌体最基础的层面上;从臣民到臣民(有时问题涉及的是地位最低贱的人),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关系,商务利益关系,职业同行的关系,对头,爱憎交加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人们可以确定,这种政治权力具有绝对主义的形式,它的资源超出了传统的权威和服从的武器;每个人,

只要他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令人恐怖的、无法无天的君主,治人之人;一整套政治网络与日常生活的网络交织在一起。但一个人必须首先占有这种权力,哪怕只一会儿,为它提供渠道,发动它,让它偏向自己想要的方向;一个人要为了自身利益采用这种权力就必须“引诱”它;这种权力,同时成为人们贪求的对象和引诱的对象;因此,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这一趋势逐渐打开了传统上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共存关系或依附关系,交由行政和政治来控制,对此人们不会感到惊讶。……

……借助这种请愿、王印文书、囚禁、警察构成的配置,出现了无穷无尽的话语,它们贯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采用了一种和坦白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也是要掌握那些无足轻重的生命所犯下的微不足道的过错。……一种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可言的低语开始膨胀:通过它,个人行为的偏离,耻辱与秘密经话语交付到了权力的手心中。琐碎的东西不再属于缄默的领域,不再是风言风语或是短暂的招供。那些平淡的事情、无足轻重的细节,含混之事与微末之辈,毫无荣光的日子以及普普通通的生活,构成它们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而且必须说出来。如果能够写下来,那就更好了。这些东西,都成为可以描述,可以记录的,就像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的机制所贯穿一样。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的编年史,才值得人们用不带嘲讽的口吻来讲述;只有血统的传承、出身与英雄事迹才赋予一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利。而如果有时确实有些卑贱之辈会得享一种荣耀,那也是借助了某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但只有当权力毫不松懈的目光逐渐驻留在那些毫末之间的乱子上,人们才开始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发掘有待揭示的秘密,才认识到,从某个方面来看,那些无关紧要之处也不容忽视。这样,话语的一种巨大可能性诞生了。至少,某种日常生活的知识(savoir)是导致它的一个原因,而且伴随这种知识,出现了一种西方社会用来掌握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存在方式和行事方式的可理解性框架(grid of intelligibility)。……就

其最初形式而言,这种有关日常生活的话语完全是面向国王的;它针对国王发言;它不得不潜入权力的巨大典礼仪式中;它必须采纳仪式的形式,借助典礼的符号。这些琐碎平庸的东西,只能在一种国王的形象到处出没的权力关系中,在他的实际权力或幻象般的潜在权力出没的权力关系中,才能被言说,被书写,被描述,被观察,被勾划,并被评价。由此,产生了这种话语的独特形式:它采用是一种夹杂着诅咒和祈求口吻的雕琢语言。……以后,无论是在沉闷的治安管理中,还是在医疗或精神病的卷宗里,都不会再发现这种语言效果。……

……所有文本的效果都来自其中的反差。在复述的事情与讲述的方式之间的反差;在那些申诉和恳请的人与全权支配他们的人之间的反差;在提出的问题的细微秩序与用来运作的庞大权力之间的反差;在仪式和权力的语言与狂乱和无能的语言之间的反差。……

会有有一天,这些反差效果慢慢都消失了。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权力将变成由一套精细、连续的分化网络构成,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和精神病治疗机构相互衔接。而在新的权力中成型的话语,就不再采用老式的矫揉造作的戏剧性语言;而是在一套自称基于观察的中立性语言中得以发展。那些琐碎平庸的事情,将会交由有效但却灰暗的管理框架、新闻报导框架和科学框架来进行分析……对于我们这些从遥远的时代回头观看的人来说,正是在这里,日常生活第一次出现在政治问题的符码中,出现了一些奇异的闪光,一些令人眩目,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东西,但此后,所谓“事务”,社会新闻或案件从这些人和事中脱胎而出,这些闪光就会销声匿迹。

这里的文本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社会将各种言辞、语句和构思起承转合的顺序以及语言的仪式“借贷”给那些无名的大众,以便让他们能够讲述他们自己,而且是公开地讲述他们自己。这样的讲述同时具有三个条件:这一话语是面向明确界定的权力配置的,并进入这一权力配置的流通之中;它展现了以前很少为人察觉的生存基础;从这些激情与利益的卑

下战争中,给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如果权力的运作只是去监视、窥探、窃听,去禁止和惩罚,那么要摧毁权力,肯定非常简单容易;但权力还在激发、唆使、生产;权力不仅仅是眼睛和耳朵;权力还产生了言语和行动。

……当设置好一套配置以迫使人讲述“卑微者”(infime),讲述那些不能讲述自身的人,讲述那些毫无荣耀可言的人,讲述那些“无名者”(infame),一种新的律令就逐渐成形了,它用来构成人们可以称为伦理的东西,一种西方的文学话语内在的伦理;它的仪式功能将渐渐消失;它的任务将不再是彰显力量、恩典、英雄业绩或能力方面轻易可见的辉煌,而是着手寻觅那些最难察觉的,隐藏最深的,在显示和讲述时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最终也就是严格禁止,最不体面的事情。……

从这里,就产生了这种话语与真理和权力的双重关系。当那些非同寻常的寓言只能在一种真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文学却在一种确定的非真理(non-truth)的情况下确立了自身:它明确以虚构的面目出现,但同时却致力于产生它自身的真理效果……文学的这种独特位置不过是某种权力配置的一个效果。在西方,这种权力配置渗透了话语的整个安排和真实的各种策略。

……

诺伯特·埃利亚斯:时间与定时

导语:

诺伯特·埃利亚斯的《时间与定时》,刘佳林译,收于《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伯特·埃利亚斯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46;英译见Norbert Elias, *Time: An Essay*, Blackwell 1992, pp. 37-48。

此文入选,一是要向经历几十年默默无闻的人生考验、在学术界“后发制人”、为历史性社会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埃利亚斯致敬,一是以此文代表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某个“抽象”范畴的“历史化”反思。对于时间、空间、记忆、认同、身体等范畴的去自然化探讨,是历史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与社会理论的核心论题建立相互关联的重要平台。埃利亚斯此文上承社会学理论中索罗金、米德等对于时间概念的先驱探讨,



下接当代社会理论中有关时间的多层次性,对于时间的权力控制与“历史”建构,乃至大屠杀和创伤记忆等议题。参考中国研究中一篇较早的相关文章: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收于《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41页,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总第12期。较早的相关译著如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当然,埃利亚斯本人的《文明的进程》(有三联中译本)和《宫廷社会》等其他众多著述,都是开拓历史社会学新视野的经典作品。

(李康)

原文:

本文论述的是时间,但并不局限于时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要处理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认识次第发生的“时间序列”的事件,世界必须出现像人这样的存在,他们能够清楚地记得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在心目中将它看做是单个的图景,从而能够把它跟后来以及现在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易言之,要认识时间,就要求聚焦物(人)能够在脑海里形成这样一幅图景,事件A、B、C一个接一个地一起呈现,但同时又能清楚地看出它们不是一起发生的。也就是说,它要求人具有独特的综合潜能,经验能够激活并塑造这种潜能。这种综合的潜能是人类特有的品质,是他们为自己定位的独特方式。人类为自身定位的方式很少像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生物那样是靠非习得的反应,而是更多地依靠认识,这些认识是通过学习、通过过去的经验(不仅是个人的经验,还包括代代相传的经验)而形成的。代际学习的能力,以知识的形式将一代人的经验传给下一代人的能力,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断改进和扩大他们的定位手段的基础。

今天我们所认识、所感受的“时间”其实就是一种定位方式。如此,它就必须在漫长世代的学习中通过经验加以发展。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并不总是用现在我们用“时间”概念来表示的那种象征方式去感受事件的联系。在人类能够拥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种时间序列的精神图景以前,他们的综合潜能需要经验特别是漫长的世代经验才能激活、得到塑造。换句话说,人类对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间”的经验感受在过去是变化的,这种变化今天仍在继续。此外,这种

变化并非无章可循或只是一种历史的方式,而是具有结构性和方向性,也就能够进行解释。粗略地说,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变化的一些结构和方向,并就如何进行解释作一些阐述。

1. 从笛卡儿到康德及以后,关于时间的一个主要假设都是基于以下的设想:人似乎天生就被赋有一些连接事件的方式,时间是其中的一种。易言之,他们认为,以时间序列对事件进行综合是先于经验来规定人类的认识的,因此它既不依赖于人类在社会中获得的知识也无须通过学习获得。这种“先验的综合”设想暗含这样的观点:人类不仅拥有建立联系的一般能力,而且拥有义务地去建立特殊联系并形成相应概念如“时间”、“空间”、“物质”、“自然规律”、“机械因果”等的的能力,因此这些能力似乎也就无须学习、没有变化了。

我要说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作为天赋的一部分,人类拥有综合即连接事件的一般潜能,但他们所建立的一切特殊的联系以及他们在交流和沉思中所运用的相应概念都是学习和经验的结果,不仅是单个人的经验,还是漫长的世代里知识相传的经验。要获得像“原因”、“时间”这样一般性概念所表示的特殊联系的知识,那么长仅一生的学习阶段显然太短了。哲学家认为人类能够凭借“先验的综合”自动地、无须任何学习就按照“时间”建立事件的联系,这是先天理性的赐予,这种观点部分是由于笛卡儿、康德及其追随者受所能获得或运用的证据的限制,部分则归咎于他们对经验的理解:说到经验,他们头脑里只有单个人的经验,而且是完全自主的实体,而不是世代发展的人类的经验和知识。

2. 认为人类始终按照现在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即均匀、统一、连续的流——去感受事件的序列(我们现在感受为时间序列)的观点既跟我们所发现的过去的证据矛盾,也跟我们现在的证据相左。爱因斯坦对牛顿的时间观进行纠正,这是时间概念能够变化的当代例证。爱因斯坦证明,牛顿假设时间是遍布整个物理世界的单一的统一体,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我们不嫌麻烦,看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我们会发现大量证明人类对我们现在所谓“时间”的感受和认识在变化的证据。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时间”是一个高度概括和综合的概念,它以大量关于测量时间



序列的方式及其规律的社会知识为前提。在早期阶段,人类显然不具备这种知识——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智慧”,而是因为这种知识本质上就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生成。

最早的时间计量法是日月星辰的运动。我们现在对这些运动的联系和规律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我们的先民却不能。

如果没有对事件进行定时的可靠标准,也就不可能有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时间概念。此外,早期人类在相互交流和思想时运用的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具体的”词语。严格地说,没有一个概念可以是“具体的”,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具体化”或“低水平”的抽象。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阶段,在我们说“夜”的地方他们说“睡”,我们说“月”的地方他们说“月亮”,我们说“年”的地方他们说“收获”或“这年的产量”。我们在撰写关于时间的论文时碰到的一个困难是缺少有关抽象的发展理论。前面所提到的从具体性抽象到概括性抽象的变化就是我们所碰到的最重大的发展变化之一,这里无法充分展开。另外,具体的时间单位如“日”、“月”、“年”等在今天我们的日历上是均匀地一个流向另一个的,它们还具有其他一些规律,但在古代却不总是这样。实际上,这是社会生活中时间计算的发展和相对完整的时间管理格式如滴答不停的钟表、连续性的年历和纪元这样的规定世纪的时间刻度(我们生活在“公元 20 世纪”)发展的结果,它们是我们把时间感受为均匀、统一的流的必要前提,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

3. 时间概念发展的模型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社会在自然中相对自主性的发展。在人类的早期,人类在自然界所建立的社会飞地规模是很小的,这些飞地和我们现在自我中心地称作“我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而直接的。人类组织在形成这些飞地时的力量跟非人的自然的力量相比显然是不占优势的,对社会事件的定时主要依赖于对不断重复的、非人力的自然事件的观察。随着人类的飞地规模(在诸如城市化、商业化和机械化的进程中)不断扩大,且相对自主性增强,它们对人造的、具有定时功能的设计和及管理器的依赖就增加,而对非人力的、自然的定时手段,如月亮的运动、季节的更替、潮汐的涨落的依赖就减少。在我们这个高度城市化和工业

化的社会,日历的更换和季节的变化之间的联系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已经不那么直接和紧密,有些情况如月与月亮的运动之间的联系差不多就没有了。人们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号世界之中,他们的社会飞地之相对自主性尽管不是绝对的,但程度上却增加了很多。我们容易这样思考和言说,似乎“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是互相独立不依的。如果不借助长时段的观照,我们很难战胜这种迷误。

4. 在讨论时间问题时,我们很容易受名词性的术语的误导。习惯用具体的名词来言说和思维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事件之联系的把握。动词“定时”立即让人们认识到,具体性的名词“时间”掩盖了定时活动的工具性特征,它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定时活动比如看表具有将事件按照两个或更多的变化——连续统一体的顺序连结在一起的功能。

那些缺少对应于英语“定时”这个词的语言,它们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的只是“确定时间”或“测量时间”这样的表达方法,这仍旧暗示存在一个叫做时间的东西,我们可以测量或确定。因此语言习惯误导了反思活动,它们不断加强着时间的神话,认为时间是某种存在着的東西,可以确定或测量,即使我们不能靠感觉来感知它。我们可以孜孜不倦地对时间这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进行哲学把握,就像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做过的那样。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对时间的秘密进行沉思,认为它是一大神秘,虽然实际上根本没有神秘可言。

最终是爱因斯坦令人信服地发现,时间是一种关系形式,而不是牛顿所认为的客观的流,不是像山川一样的造物中的一部分,虽不可见,但却像山川一样独立于定时的人。但就是爱因斯坦的研究也不够彻底,他也没有完全摆脱词语崇拜的压迫,并以自己的方式给了具体化时间的神话以新的支持,比如他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时间会收缩或扩张。他只是在一个物理学家有限的参照术语中讨论时间问题的,而对时间概念的批判性研究需要对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关系有所认识,也就是说,需要对“自然”环境下的定时活动和“社会”环境下的定时活动的关系有所认识。但这不是他的任务,也不是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做到的。



5. 人类社会在非人的“程式”(如我们以前所说)的稳步扩展形成了一种话语模式,让人觉得“社会”与“自然”应该是独立并存的,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背道而驰的发展更强化了这种感觉。然而只要我们仍然孤立地去研究物理的时间和社会的时间,时间问题就没有任何解决希望。如果我们把时间转换为动词形式并研究定时问题,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对社会事件的定时是不能完全跟对物理事件的定时分开的。随着人造定时器的发展,社会定时相对于非人的物理事件的定时来说其自主性增加了,它们的联系也不那么直接了。但这种联系不会中断,实际上也中断不了。但很久以来,人们的社会需求促使人类对“天体”进行时间测量。不用说,后者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并将继续独立于前者,尽管两者始终是相关的。

如果我们不能牢记,宇宙的物理层面跟社会层面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关系,易言之,如果我们不懂得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出现在更大的非人的宇宙之中并在其中发展的现象,我们就不能攻克时间问题最关键的一面。我们可以将这个关键问题简要地表达为:在物理学中,因此在支配性的哲学传统中,“时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但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时间”却是具有很大强制力的条条框框,只要你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时迟到,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传统的研究“自然”与“社会”因而物理“时间”与社会学“时间”问题的做法是将它们看做彼此独立的问题,这自然导致一个似乎是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潜伏在我们对“时间”的讨论中:一个总的说来是高度抽象的东西怎么能够对人有很大强制力呢?迄今为止,时间社会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一方面,人们主要还是按照传统的哲学方式来研究时间,甚至社会学家也这样做;另一方面,只要人们固守短时段观点,时间社会学研究就很难有所建树。只有用长时段观点和发展的、比较的方法,这种研究才会走向繁荣。

6. 人们已经发现,很多熟悉的说法给人们一种感觉,好像时间是一个客观事物。时间就会避免这种幻觉,它清楚地昭示,时间测量或同步是一种人类活动,有着明确的目标,不仅是一种关系,还是建立关系的能力。问题是:谁关联着谁,为了什么目的?

通向答案的第一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会说,“时间”是一种关系的象征,一个人类集团,即一个有着天

赋的记忆和综合能力的人类集团,在两个或多个变化的连续统一体中建立起关系,其中一个为另一个(一些)的参照系或衡量标准。潮汐的涨落,日月的出入,可以作为这种变化的连续统一体,但被社会化、标准化了。如果这些原始的、自然的序列太不符合对精确的要求,人类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来建立更准确更可依赖的序列以作为其他序列的标准。时钟就是这种造物,它完全是人造的物理性的变化连续统一体。在一些社会,时钟被作为标准的参照系,是测量其他社会的或物理的变化连续统一体的手段。

因此,将不同的变化连续统一体彼此联接为“时间”,就至少联接了三个统一体:联接的人以及两个或多个变化连续统一体,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里,一方发挥着标准的统一体的功能,是另一方的参照系。即使社会中的个人用他本人作为参照系,比如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作为记录其他事件时间的标准,关系从功能上说仍然是三极:一个是整合、定时的个人;一个是从生到死的变化连续统一体,被作为标准的统一体的个人;一个是众多的变化,他根据自己的生命长度、自己的变化连续统一体来测量这些变化。

为避免误解,我应该补充一句,只有在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个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标准的连续统一体从而给事件定时。在这样的社会,个体不但可以成为鲜明地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独特存在,他还可以根据另一个公认的标准统一体比如日历年的序列,非常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生命时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一个阶段以后才碰到的问题,并能够按照纪元的方式建立一个相对合适的时间计算方法,比如希腊人按照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对事件的日期进行记录,罗马人从“罗马城建立之日”起纪年,犹太教和基督教则按照纪元纪年。

在那些没有这类人造的、长时段的、纪元历法标准连续统一体的社会,人们在说到他们的出生或年龄时,如果不提到一些单个的事件如“大风暴来的时候”或“正当老酋长被杀之前”就无法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社会标准的统一体作为变化的连续统一体的参照,每个统一体都是他们自己。因此,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一个人在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记录其他变化之时间的参照系时,他还暗自用在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变化连续统一体,用纪元历法来作为自己这

个统一体的标准。

“定时”最基本的意思就是确定一个变化——可以重复也可以不重复——是否发生在另一个变化之前、之后,或者是同时发生。如果是一个变化序列,那么“定时”就是指根据社会认可的定时标准来回答各变化之间的间隔长度,比如两次收获之间的间隔,或两次新月之间的间隔。在差别特征更强的层面上,我们还可以根据社会认可的标准的变化连续统一体来确定一任、一朝或一生的起讫或我们所说的“古代”与“现代”的始终。人类“定时”事件因而根据“时间”来感受事件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碰到的问题需要定时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组织 and 知识能够让他们用哪一组变化去作为另一组变化的标准。

7.“我们什么时候该做它?”这是人们开始定时历险时碰到的主要问题。人们努力进行定时活动的出发点始终都是自己的行为,在早期阶段,是一个集团的行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开始对自己的活动进行“定时”的,他们还没有遇到明确以什么时候这样的问题表达出来的问题。在这些阶段,定时是被动的,几乎不是反思性的或理论化的,并且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被动的定时我们今天还在继续。因此人们多少会根据自己动物冲动的压迫来定时活动: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在我们的社会,这些动物性循环活动则要受制于一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人们按照社会时钟来规训自己的生物钟。在比较原始的社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那里,生物钟的管理(如果我们可以说“管理”)和形成更直接地取决于非人的自然或(有时是)可以经得他人允许或者阻止我们满足需要的程度。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会在感到饥饿的时候出去打猎,而在饱足时休息。或者,当这种被动定时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他们会日入而息,日出而作,其理论认识活动也是跟“睡觉”相关而不是“夜晚”相关。因此,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发展阶段,人类几乎没有社会性的定时问题,而后者却要求人类自身的集体活动积极地跟宇宙中的其他变化同步。

当人类积极投身他们的食物生产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农业,驯化植物的采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阶段,(除被动定时外的)积极定时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积极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控制问题,越来

越突出。因为在控制和利用植物时,人类开始受制于一个以前所不知道的约束,这是驯化植物本身的要求所施加人类的约束,而人类的食物供给就依赖于这些植物。

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几乎所有地方的祭司都是主动定时活动的第一个专职人员。当更大更复杂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时候,祭司通常要跟世俗的国家权威一起分享决定何时进行某项社会活动的功能,其合作往往是不稳定的。当祭司跟国王争夺主宰权的斗争变得对国王有利时,时间安排就像铸币一样成为国家的垄断。

对井然有序的、统一的时间计算法的需要,是跟国家的兴衰,人民与疆土的规模及统一程度,相应地,他们在工商业联系方面的差别和紧密程度紧密相关的,这并不奇怪。国家的司法机构需要统一的计时器,以适应摆在它面前的案子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数量不断增加的各种人类活动同步起来,拥有一个平稳运行的连续的时间格栅作为一切人类活动的共同参照系,这样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中央权威(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职的)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这种参照系并监督其实施。税收、利息、工资定期有序地支付,其他许多合同、契约的履行,都要依赖这种参照系,许多圣日或假期也要靠它,那时人们方可停止劳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些需要的压力下,教会和国家权威作为定时的垄断者是如何努力应付这一任务的。

历法是发展着的连续性的一个例子,尽管有许多政治的和其他的不连续性,它仍然持续着——此前我们称为“变化的连续统一体”,这种定时框架的演变不无启发性。它提醒我们,所谓“时间”实际上常常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网络,定时基本上是一种综合,一种统合活动。在这方面,人们最初是用天上的自然的变化连续统一体作为相对变动较快的社会变化统一体的标准,因为跟人类活动相比,自然的变化统一体变得很慢,以至相对人类来说,它似乎根本就不变。通过多少有些主观地把太阳的某个位置(也许是根据太阳和其他星体的关系)定为一个社会定时单元——一年——的起点和终点,人类能够建立一个参照系来同步自身的活动。千百年来,人类在成功地制定一个历法时标,以适应物理的连续统一体,并能够为以国家

形式聚合在一起的人们、现在则是为全球各国提供一个整一的同步标准方面,可谓举步维艰,这说明这样的工作是何等的困难。

8. 显然,人类要建立一个纪元时标,以表示连续的几百年或几千年,保证活着的一代能够在世代之中准确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更加困难。制定这种不重复的时标导致了特别的困难。早期的做法是根据统治者的顺序和每一朝的时间来计算过去的时间。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纪元时标是按照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来计算世纪和年份的。只有当社会单元比如国家、教会具有了长久的变化连续统一体的特征,其中活着的集团——通常是统治集团——发现有必要让他们的体制能够准确完整地永葆对政体的连续性的记忆,确立不重复的长时段的计量标尺才成为可能。

塞维尔:三类时间性:迈向事件社会学

导语:

塞维尔:《三类时间性:迈向事件社会学》,应星译,刊于《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历史社会学”专辑;William H. Sewell,“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载 McDonald(编)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1996:245-280。

本文分析、批评了巴林顿·摩尔、斯考克波尔、查尔斯·蒂利、沃勒斯坦等侧重宏观结构比较分析的著名历史社会学家的方法论预设,体现出历史社会学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对于时间、事件、实践等范畴的多重性的认识,将“历史社会学”真正“历史化”的努力。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选文删去了大量具体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例证,因而多少呈现出一种非事件性的元叙事性风格。而这正是作者要反对的。

(李康)

原文:

过去二十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历史方法在美国社会学中的被广泛运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美国的社会学还完全被对当代美国的研究所支配。但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使受教于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的研究生对社会变化的兴趣要比他们的先辈浓厚得多。新一代没有去寻

找美国社会(它被含蓄地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运作的不变法则,而是开始问:世界上不同的社会是怎样在资本主义和西方支配的影响下产生变化的?这一思路是由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样勇敢的历史探索者所开拓的,而后,它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年轻社会学家中得以风行起来。

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历史社会学已被看成社会学这一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关节点。美国社会学协会(ASA)两个历史取向的正式分会的成立表明,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制度的承认。这两个分会,一个是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我的一个社会学家朋友喜欢将它说成是“韦伯左派”;另一个是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会,它显然是沃勒斯坦派的。……

历史社会学若干指导性的宣言和纲领性的阐述一般都很看重方法论上的问题,特别是看重比较方法(参见 Stinchcombe, 1978; Skocpol 和 Somers, 1980; Skocpol, 1984; Tilly, 1984)。历史社会学家为其在 ASA 的分会取名为“比较历史社会学”,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即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与对历史主题的强调是同等的。历史社会学家藉此使他们跻身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行列中。他们通过强调比较方法,热切地分享了这门学科是证明自己是一门科学的过分关心。毕竟,当个案的数量不够多的时候,比较方法是对主流的统计方法通常的替代。历史社会学这种自我展现的方式有助于使历史研究为这行业的其他人所接受。因为这种辞令意味着,历史社会学既不会构成理论上的威胁,也不会构成认识论上的威胁,它仅仅是研究历史的社会学,其所用的方法与适用于研究当代的社会学的方法是近乎相同的。

……

直到最近,也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详细地谈到是什么使他们的社会学是历史的。如果历史社会学仅仅是研究历史的社会学,那么,它之所以有价值,首先就在于它增加了数据点(data points)可获取的数量。许多社会进程都需要一个重要的时段才能使其被理解。如果我们研究的仅仅是现在的社会进程,那我们就不仅仅是在冒险研究不完整的序列,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个案的数量。但历史只意味着更多的数据点吗?使社会学是历史的社会学,这难道不是在引入时



间性(temporality)这种完全不同于正统社会学思维的观念吗?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来给时间性下定义。我将当前流行的对历史社会学中的时间性下定义的方式称之为“目的论式的”和“实验性的”。这些定义方式使历史社会学对主流社会学的挑战被降至最低处。但还有第三种、现在尚处于边缘的定义,我称之为“事件性的”时间性。它所具有的颠覆主流社会学的潜力要大得多……将历史进程看成是被一连串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变性的(contingent)事件所决定的。

目的论的时间性

社会学是在目的论的招牌下诞生的。19世纪社会学伟大的创立者们(如孔德、马克思、涂尔干和滕尼斯)把历史看成是遵循着社会发展某种内在逻辑的时间之流:从宗教的到形而上学的再到科学的时代;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或从共同体到社会。对这些社会理论家来说,历史是被超历史的进步法则所形塑的。历史的方向和意义不是历史表面那些带有很大的偶变性的事件造成的结果,而是某些久远的、莫名的起因作用的结果,特殊的历史事件至多是那些力量的体现而已。实际上,在19世纪,对进步的这种信念非常普遍。随着这种信念的衰落,人们逐渐放弃了社会学思想中明显的目的论。但不太明显的目的论形式仍在我们中很常见。

有一种目的论解释,把历史发生的原因既不是归于造成事端的行动和反应,也不是归于形成或制约这些行动和反应的、可具体指明的条件,而是归于导致了后来某些历史状态的、抽象的超历史过程。换言之,在某些历史时刻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是被人们用后来的事件来解释的。……比如,将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贴上“退步”和“进步”标签这种常见的做法就暗含了这种解释策略。按通常的用法,所谓“退步”的运动是指某个特定时期的生活和文化中那些被给予这种评价的方面,即分析家们用他们正确无误的事后聪明判明它们是注定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而所谓“进步”的运动则是指某个时期的生活和文化中那些从后来所证明的生命力来评价的方面。……类似地,“现代的”这个术语常常用来作为那些被分析家认为是在推进某个时刻的未来的进程或行动力量

的标签,而“传统的”这个术语则被用来作为这个时刻同样在起作用、但被分析家认为是在向后退的另一些力量的标签。社会科学中整个现代化学派就是以这种对时间性的目的论概念为基础的。但这种目的论的谬误也遍及于许多历史社会学家的著述中,尽管他们把其著述看做是坚定批评现代化理论的结果。我将通过简要地分析两位历史社会学家的著述来尝试说明一下这种断言。这两位学者在以当代的历史社会学来颠覆现代化学派的理论取向上特别有影响,他们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查尔斯·蒂利。

作为社会天文学家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是目的论色彩甚为明显的个案。沃勒斯坦在他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多卷本历史中,证明了他自己与其他的社会学家一样,都急于为其知识找到可靠的、科学的根据。但因为他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巨大而独特的,常用的定量和实验科学模式几乎都无法适用——没有适宜与现代世界体系作比较的其他东西。沃勒斯坦在他第一卷的导言中讨论了这种困境。他十分担心他的“分析单位”是“唯一的例子”;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他也许就会被简化为仅仅是在写历史。但他“并不是对写历史感兴趣”;他想要发现历史的规律:

“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否会有规律呢?严格地说,当然不可能有。因果性和概率性是由一系列类似的现象或类似的事例才得以表述的……但此时此地的现实是明白无误的——只有一个现代世界。”(Wallerstein, 1974, 7)

……沃勒斯坦推论说,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某类现象中唯一的一个的话,那么,对它的研究可以遵循一门被完全承认并富有影响的自然科学的模式,这门研究某个独一无二的体系的独特发展的科学就是天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天文学中把整个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宇宙学。……

我认为,与宇宙学的这种类比决定性地塑造了沃勒斯坦的研究对象,尽管这种塑造部分是基于创造性的误用。这种类比认为部分与整体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因而,可以推想,研究局部现象时所发现的规律也在整体的层面产生作用。这个关键的假设(即局部的过程和整体的过程共享同一因果律)是个重要的授

权。它允许沃勒斯坦有一个有力的、统一的视角,使他将发生在不同时空、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事件不是看做由地方性条件带来的机遇而决定的,而是看做由世界经济体的推动力所决定的,那些地方性事件不过是世界经济体的组成部分。……

但沃勒斯坦在将天文学者关于因果律的统一性应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已经倒转了部分—整体关系的方向。……在当代的宇宙学中,无限大的动力的谜底可以在无限小的动力中找到。

但沃勒斯坦抛弃了通过支配着世界体系最小的实体——一个人的原则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动力的模式,无论这些动力是来自行为主义心理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一旦我们开始从空间上和时间上将地方性事件解释成它们是因其在世界演化全景中的位置而来的结果,我们就与目的论的解释相去不远了。

沃勒斯坦所误用的天文学类比也以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助长了目的论。他认为天文学使他获得了由果溯因去推论的正当性,也即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现在的状态去推论它以前的状态。……沃勒斯坦这位社会天文学家实际上是设想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作为封建主义解体的结果,欧洲经济开始一直处在危机之中。由于欧洲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即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欧洲经济被决定性地注入了一种崭新的、势不可挡的动力。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地理大发现建立起了关键性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关联,根据这些关联就可预言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一个在空间上被分割开来的世界经济体的规模是太大了,它无法被任何一个相互竞争的、强加于人的政治单位所控制。

沃勒斯坦……的工作包含了对他所研究的那一段欧洲政治史和经济史所进行的一些敏锐的事件分析……他所讨论的这些实际上都充满了偶变性、未预期的后果和具决定意义的选择性。但在沃勒斯坦的分析中,这些偶变性、选择性和后果都被世界体系产生起就具有的必然性所注定了。隐藏在沃勒斯坦的大爆炸理论背后的,是一个远为有趣的问题,即地理大发现这个关键性的但并未决定最后结果的事件是如何引出一长串接踵而至的、没有决定最后结果的事件的,这些事件逐渐地但绝不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出现。

……人及其所创造的社会比物理事物要远为任性。人不像行星、银河或亚原子粒子,人有能力评价他们所在的各种体系,有能力按可改变体系的方式去行动,而其行动又难以准确地预计其后果。在人的历史中当然有转折点或关键性的事件,但不可能有大爆炸。将对人的历史的分析建构在与天文学作类比的基础上,就会导致某种目的论。在这种目的论中,某个关键性的历史事件被误读为一种包孕着社会体系(如果有的话)的整个未来的绝对起源。而接连在发生的、部分具有偶变性的事件则被剥夺了它们的效力,被化约为通向不可避免的未来的道路上的标记。

查尔斯·蒂利和历史的支配性进程

……

蒂利在他论集体暴力的多部著作和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中暴力形式的变化,即从“反应型的”(reactive)暴力到“先发型的”(proactive)暴力的变化。所谓“反应型的”暴力指的是落后的、地方取向的暴力;所谓“先发型的”暴力指的是进步的、全国取向的暴力。简而言之,这种变化是国家中心化和资本主义逐步的但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的结果。这样的分析并不必然是目的论的。比如,蒂利认为暴力对抗在目标上的变化部分起源于国家力量表现在地方上的特殊性及其可变性,这里就没有暗含着目的论。然而,蒂利的分析常常还是表现出某种目的论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假定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的中心化)总出现在蒂利的文本的背后——而在他的文本中,那些原因倒基本上被视为变动不居的力量,也可说是一种永远的酵母。故而,蒂利所大量描绘的暴力事变就只能被看成是无形的却始终在场的原因产生作用的结果。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事件,因为它们只是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蒂利否认史家心中的大事件——法国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集体暴力的性质;在他看来,那仅仅是导致了以前一直就存在着的趋势的某种加速而已(Tilly, 1977, 1986)。故而,尽管蒂利在《旺代》中包含了给人启发的事件分析,但他在论法国集体暴力的著述中占支配地位的修辞还是没有能摆脱目的论时间性的概念。

希达·斯科克波与实验性的时间性

如果沃勒斯坦和蒂利是目的论时间性持续支配



着历史社会学的例证,那么,希达·斯科克波则是实验性时间性主要的倡导者和范例。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斯科克波明确地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学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并将其用到了历史研究中。她断言,比较历史分析

“特别适用于对只有少数实例的宏观历史现象进行解释。相较之下,经验研究适合于更丰富而又易于把握的现象,而具有大量实例的现象则需要使用统计分析。实际上,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多变项分析方法,当变项太多而实例不多时,人们就可以使用它。”(Skocpol,1979,36)

斯科克波将她的比较方法运用到了三个现代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即法国、俄国和中国。她的分析试图开创比较的“自然实验”,以能够找到解释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她分析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分析了从不曾演化成革命的两场巨大的政治危机(1807—1814年的普鲁士改革运动和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以及没有变成社会革命的两次政治革命(1640—1688年的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及1848—1850年的德国革命)。斯科克波在比较分析这七个个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关于社会革命原因的一种强劲而复杂的理论。她一开始就注意到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国家在军事竞争上都已落在了对手后面。这就促使其试图通过着手广泛的行政、经济和财政改革来迎头赶上。但改革在所有这三个国家都遭到了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抵制,他们在国家中有足够稳固的基础来阻扰、减缓乃至颠覆革命。其后果就是出现了深刻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破。这些思考使斯科克波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两个条件:存在着国家在军事竞争中落后于对手的情况;存在着占据支配地位、有足够力量阻扰国家发起的改革的地主阶级。她通过分析普鲁士和日本的个案,强化了对革命原因的这一判断。在那两个个案中,国家都由于军事竞争上的失利而陷入了危机,但因为普鲁士和日本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几乎没有多少抵制国家的政治能量,国家权力机构内部出现的改革者在排除政治革命的介入的前提下努力地使国家得以新生。

但斯科克波也发现了社会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军事落后为基础、由顽抗的地主的

抵制而恶化的财政危机也许足以引发政治革命,但这些革命要变成社会革命,也即导致国家的阶级结构的转型,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农民阶级大规模的反抗。因此,社会革命就要求存在着组织有力、独立自主的农民团体,他们有能力在政治革命中利用国家权威的衰落。斯科克波又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条件是如何存在于她分析的这三个个案中,而17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中叶的德国又是如何不具这样的条件,因而不曾从政治革命演化成社会革命。总之,斯科克波用了准实验性的、归纳的方法来发现社会革命的三个因素:(1)军事落后;(2)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阶级;(3)独立的农民团体。按照我对此的理解,这些因素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概念总结的:引发政治危机的因素一;将政治危机变成政治革命的因素二的补充;将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因素三的进一步补充。

斯科克波通过分析这七个个案得出的这种解释是极为有力的……但她的解释的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她所声称的对准实验性归纳方法的运用。正如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89)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仔细分析斯科克波的逻辑和证据,就可以看到:她的分析绝不是由她书中所用的“自然实验”来加以证实的。……17世纪英国和19世纪中叶德国的例证实际上像是驳斥了她的起因理论中的因素一,因为它们都不是由军事失败所引发的真正的政治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当然是源于财政危机,但不是源于由军事厄运所引发的财政危机;1848年3月的德国革命既不是由军事厄运也不是由财政危机所引发的。斯科克波的比较实际上说明了一点:广泛的政治革命也许会在她所说的头两个因素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发生。

其次,斯科克波用来作比较的一批个案并没有说明,对产生社会革命来说,必然完全是这样排序的三个因素。要做到那样,斯科克波就得找到这样一个个案,在这个个案中,军事失败和地主抵抗导致了政治革命,但没能发展成社会革命是因为缺乏独立自主的农民组织。但她没有这样的个案:明治维新和普鲁士改革运动都只有第一个因素,英国革命只有第二个因素,而1848年的德国革命则这三个都没有。在斯科克波的证据的基础上,人们从逻辑上可以推断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军事落后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这两者本



身就足以产生出社会革命。

实际上,斯科克波对中国革命的分析的确就可以被读解成对我们这种假设的支持。在这个个案中,社会革命发生在开始只存在斯科克波所开列的诸因素中头两个因素的国家中。……农民缺乏独立于地主的能力长久地阻碍了1911年开始的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只有到1940年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才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农民团体,从而产生了实行社会革命所必须的农村的打击力量(Скоцпол, 1979, 252—262)。但这个分析实际上是非常含糊的。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国家与地主之间长期的僵持由1935年日本的入侵而进一步恶化,从而在国民党不再能控制的地区产生出了成功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团体相对于地主的独立性的获得,与其说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不如说是在成功地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局部地区实现了社会革命的结果,而这场革命则是由因军事失利而陷入僵局中的国家的沦陷所引发的。

斯科克波在分析中的这两个缺陷使她关于从经验上证实了她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声称是无效的。她既没有证明,政治革命可以由军事厄运和地主对改革强有力的抵制这两者来解释;也没有证明,独立的农民组织对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是必须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缺陷并不是比较方法本身固有的。斯科克波研究的这种现象如此少见,以致于她无法聚集一批足够验证她理论内在的所有逻辑可能性的例证来。……准实验比较方法最棘手的问题不是来自于收集足够例证的困难——那只会影响某些研究问题,而是来自于严格坚持实验逻辑所要求的、在时间性上的非历史假使。……

斯科克波所研究的革命要服从她的比较方法,就必须把它们概念化为类似于一个实验中的独立“试验”。这就是说,这些试验必须既是相同的又是独立的。相同的原则意味着每次新的试验(在这里指的是新的革命)都得是原先试验真正的复制品,而所有相关的变项都保持不变。这就暗含了对时间性限定性的假设。在实验逻辑中相关的时间性完全是内在于试验的:必须先有假设的原因,才有假设的结果。而相反地,从对试验的定义来说,历史时间外在的时间性(无论是一次试验的开始还是另一次试验的接续,

无论有多少次试验)必然会被看成是无关的,这样才能满足实验中的试验要严格地相同的要求。

……斯科克波为了用归纳性的比较,她就必须承认,她那三个巨大的社会革命实际上是被同一个起源规律所支配着的同一类对象。但这是一个很可疑的假设,这部分是因为新的阶级和新的阶级关系在与时俱增。这也许反过来又改变了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试验是相同的这个假设(这是斯科克波比较方法的逻辑基础)不允许她去探究这个问题:在革命之间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可能影响革命的出现和结果的。

实验逻辑的第二个基本假设,即实验中的试验必须彼此独立的假设,也对斯科克波的分析提出了严重的问题。要使试验是独立的,那任何给定的试验结果都必须对随后的试验结果没有影响。然而,断言早先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没有影响,这是荒谬的。……只有在“凝固”和“割裂”历史的情况下,在将这三次革命的历史看做它们好像是互不关连地发生的而非一系列有历史关联的事件的情况下,这个假设才可能得以维持。……

指出“有各自起因的进程后来的汇合并逐渐展开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她那本书富于特色的叙事策略。它不仅有别于社会学家常用的策略,也有别于史家常用的策略。对革命的社会学分析往往强调把革命某个独一无二的起因放在首位,而常常使其他起因都服从这个被挑选出来的解释因素。史学的分析则常常试图详细描述一场表面看似起因很复杂的革命的过程,而它们对这个革命过程不同的起因特色的分析仅仅是使自己在故事的展开中被模糊地感觉到。史学策略的问题在于,关键性的起因进程容易迷失在叙事细节造成的混乱中,而很少被分离出来,足以使其独立的推动力变得清晰起来。社会学策略的麻烦在于,尽管它成功地指明了一个方面的起因推动力,但它常常不是用所挑选的这个起因来吞并其他起因(就像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处理常常是把国家仅仅看成是阶级力量的表现一样),就是将其他起因仅仅当做是背景(就像对革命的多数研究将它们处理成国际军事背景一样)。斯科克波的策略是一个给人启迪的妥协方案。它借用了社会学的策略,但不是把它用在一个而是用在几个不同的起因进程上。而通过强调“后来汇



合并逐渐展开的相互作用”，它也借用了关注事件、接续和偶变性的史学策略。除了对比较实验归纳的考虑之外，斯科克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还阐发了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是多重起因叙事的有效策略……用以研究事件是如何通过对结构的削弱和重新安排而引发更多的、具转折意义的事件的。但这种重要的修辞和理论创新从未在她的导言和结语中表露出来……

……是比较产生了假设，而这些假设潜在的概括性是由它们对这三个个案类似的因果过程以汇合的方式展开这一点作出说明的能力来测定的。如果关键的问题真的是斯科克波假设的起因在这一批个案中是否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写这么厚一本书了——一篇有一些简单的表格的短文就足够了。……“证据”与其说是在那种形式的逻辑，不如说是在偶然性的细节上成功的叙事安排。因而，斯科克波的比较史的高峰不在于那种对抽象概括的严格检验，而在于一种类比的发现，正是在这种类比的基础上，可以建构起对事件序列崭新而令人信服的叙事。

事件性的时间性

事件性的时间性承认事件在历史中的力量。……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定义“事件”(events)：一种从数量上说相对稀少、从重要性上说已使结构发生了改变的事情。……

时间性的……实验性概念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假设：因果律超越时间的统一性；前后相继发生的所有事(occurrences)在因果上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事件性概念对这两个假设都拒绝了。它不是设想因果在时间上的独立性，而是设想事件通常都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在早些时发生的事件会影响晚些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出现时可能的结果。……目的论的和事件性的时间性共享着路径依赖的假设，但目的论时间性拒绝时间上的异质性，至少拒绝一般的时间上的异质性。……时间性的事件性概念认为偶变性是非常普遍的，它不仅表现在表面上，而且表现在社会关系的核心或深层。这种概念认为，偶发的、意外的、内在不可预测的事件可以消除或改变历史看似最持久的趋势。……历史既会展示顽固的韧性，也会展示突然的中断，甚至最激进的历史断裂也交错着引人注目的持续。说事件是结构的转折点，这恰恰意

味着从一个事件中浮现出来的结构总是既有结构的变形，因此它们与以前的结构既是连续的又是有的。普遍的偶变性这个假设意味着的不是一切都经常在发生变化，而是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受变化影响的。

……

事件社会学？

……对社会进程恰切的事件性分析看起来更该像是被精心讲述出来的故事或叙事而非物理规律。事件性的历史社会学更能接近历史。……历史社会学家在传统上把史家更多看做是有用的蜜蜂而非真正的知识合作者。史家做的是收集档案材料并生产叙事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而历史社会学家则把叙事当做他们进行更宏大的、理论上更复杂的分析的原材料。历史社会学家的新一代已经追随史家走进档案中去了。但如果他们要建构事件社会学，那他们将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也还得依靠史家及其叙事给予理论的灵感。

……我相信历史社会学(也许是整个社会学)应该以事件的方式来被重新塑造，而这样一种重新塑造会成为超越现行的做法的一个激进起点。但我也相信，社会学的重新构型只有运用和归并既有的社会学分析模式才会成功。……我试图用自己对沃勒斯坦、蒂利和斯科克波的批评来表明，采取一种事件的方法并不要求抛弃所有那些采用目的论或实验性时间性概念的著述。我倒在努力展示经典的目的论式的和实验性的研究如何可能被重新思考，以提炼出那些有价值的、但现在被那些误用的科学修辞所掩盖着的事件分析。我认为我们需要恢复《现代世界体系》、《旺代》和《国家和社会革命》这样的作品作为事件社会学杰作的名誉，尽管它们在修辞上有其缺陷。同样地，我们并不是要抛弃比较方法，而是需要摆脱其不适当的科学修辞，将它作为这样一种工具来重新加以考虑，即把它作为从理论上来说明通过环环相扣的发现来进行的因果关系叙事的工具。

……

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

导语：

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



史》(戚学民译,刊于《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这篇写于上个世纪末的文章出自一位也许已经被视为老派的海外中国研究名家。风水轮流转,学术似时装。从旧文化史、精英史、叙事史、政治史,到社会经济史、结构史、计量史,又到新文化史、叙述的复兴、个人的复归,更有所谓不满于新文化史而提出的后社会史。对于中国研究,这里的麻烦不仅在于总觉得紧赶慢赶不上趟儿,而且别人(究竟谁是谁的它者呢?)的问题意识终归不是我们的,更何况,我们已经可以“旁观者清”地理解革命、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了么?

另可参考沙培德(Peter Zarrow)《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洪静宜译,收于《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原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卷22第4期。此文视野似更宽广,也许正是因为中国研究与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进展愈益合拍。海外中国研究近年来的许多优秀作品,以及汉语学界在了解国际学界的基础上开掘自身问题意识而作出的出色研究,已经让人看到了本土研究反向形塑国际学界核心议题的趋向。

(李康)

原文:

二十多年前曾在哈佛大学以“中共农村根据地(1922—1949)”为主题举办过一次著名的会议。那次会议上,霍夫海因茨尖锐地批评了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的众多年轻学者。他遭到质疑的观点是“革命或反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的确定不移的事实。”(霍夫海因茨,1977年著作,序言)。……当时,这场争论中“进步”的一方认为社会—经济结构才是重要的,且形成了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或原因)。

我以这个例子启始是因为有必要告诉更年轻的同行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为社会史进行辩护是一种进步的立场。虽然我不相信那时我们中的任何人会相信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我们深信社会和经济是重要的。……

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这反映了在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最近当我读到一篇由费约

翰所写的引人争议的文章时——它刚刚登在新近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杂志的专号上,我才意识到这一过程已走得多远了。这篇文章探讨了研究二十世纪的几种新思路,并讨论了许多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其间仅仅一次顺带提及“革命”这个术语。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周锡瑞,1995)。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做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

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并且特别转到了上海。关于中国城市的学术新成果与韩起澜(Emily Honig, 1986)和贺萧(Gail Hershatter)所写的早期作品迥然不同。《姊妹与陌生人》和《天津工人》都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保持着关注,是优秀的社会史著作。虽然我不能说城市社会史在20世纪90年代被放弃了,但是毫无疑问向文化研究发展是一股强劲的趋势。如要举例,可以想一下近来出版的突出作品,如1995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1993年傅葆石(Poshek Fu)的《顺从、抗拒和合作》,瓦瑟施特伦(Jeffery Wasserstorm)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运动》和叶文心(Yeh Wenhsin)的《分裂的学园》(《疏离的学院》)。也许这个趋势在1997年贺萧的第二部专著即关于上海色情业的《危险的愉悦》中,能看得更清楚。虽然我不会持有像Christian Henriot在《中国季刊》上所表达的那种敌对观点,但我不得不对这一情况感到惊诧甚至失望,贺萧全书精彩的研究中几乎不注意分析上海社会色情业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和场所,而是津津乐道于导游手册、改革者的作品和小报,把它们当做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对话”来讨论(第8页)。

即使革命史仍旧是关注的焦点时,文化研究的方法在其中也特别突出。在民国史方面,费约翰1996年的获奖作品《觉醒的中国》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更加惊人地依赖文化研究方法和肯定话语权力的是阿普特(David Apter)和赛茨(Tony Saich)1994年的《毛的共和国的革命话语》。其主要的工作是证明“颠倒的(即革命的)话语怎样产生权力”(P. xiii)和把“延安

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比作“其权力源于话语的宗教救赎运动”(第184页)。因聚焦于话语而产生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此处暴露无遗,而对于为什么毛的特殊的“颠倒”的话语比其他党内外竞争对手的话语更具威力这一问题,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比较了近期清史研究的某些成果,20世纪中国研究中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就更加惊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棘手的史料问题,清史研究仍然有一大批社会史的著作。不过即使这些作品比起70年代以来的同类作品也对文化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但仅仅这些书名如埃菲琳·罗斯基(Evelyn Rawski)的《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1999年Melissa Macauley的《社会权力和法律文化》,1998年的Sucheta Mazumdar的《糖与中国社会》就表明了社会史在清史领域中仍保持着活力。除了玛兹穆德的专著,王国斌(R. Bin Wong)1998年的《转变的中国》和李伯重1998年的《江南农业的发展》显示了经济史依然在继续繁荣。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文化研究的方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即使在性别研究方面,我们也会在Francesca Bray的《科技与性》中不期然地找到比20世纪中国史领域的绝大多数成果更接近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

……进入20世纪晚期,一个独立而类似的模式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开放田野调查使社会科学家从早期的对精英政治的关注,转到了非常成功地探索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模式的田野调查工作上。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在近期发表的著作中,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如果仅限于最近几年农村社会与经济领域出现的重要著作,我们就可以举出阎云祥1996年的《礼物的流动》,景军的《记忆的圣殿:中国村庄中的历史、权力与道德》;Gregory Ruf1998年的《干部与亲族》;1997年Dawid Zweig的《解放中国农民》;1997年Kinley与Griffin的《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

近年来已有很多文章谈到需要打破“1949年障碍”,贺萧、黄宗智、裴宜理和瓦瑟施特伦这些学者的著作已经证明跨越1949年障碍是有益的。但我们正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上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非常关注当代农村社会,但是几乎无人研究民国时期这一领域的状况,因此无法找到共同语言。

……文化史研究的流行显然在很大意义上直接

反映了历史学科内(实际上是所有的人文学科)的一个总体趋势,一个至少在上述的著作里和《美国历史评论》的纸面上一样明显的趋势。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因素肯定要为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研究事实上的消失负责。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城市、现代性和认同的研究——都是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特别关心的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已经兴盛起来。

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

文化史研究(特别是对更年轻的学者而言)的引人之处,是人生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我这样的老顽固不得不去适应的。而我并不认为那种前景没有吸引力。实际上,几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在进行文化史研究——从电影审查制度,到杭州的旅游业,老北京传统的再生,重构京剧成为国剧的过程,到运动和体育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最使我着迷的是改变了现代中国的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和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相反地,近来某些成果使我担忧的是文化研究反映出舒德逊(Michael Schudson)已经在社会学中警告过的同样的问题。用舒德逊的话说:“从文化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常常包含着一个从强调现实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一个强调现实由文化或符号构成的观点(似乎这是一个发生在社会之外的过程)的下滑过程”(见舒德逊1997年著作,第50页)。

我对历史过程的肇因问题总是格外感兴趣(实际是着迷于它)。福柯(他的著作对近来绝大多数文化史研究是如此重要和富有影响力)坚决拒绝对他在现

代性的话语和实践中揭示的根本断裂的原因作出任何分析。就福柯而言,他的观点来自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批判。但是在文化史的研究中福柯的观点导致了轻易把变革的力量归诸权威话语自身(如阿普特和赛茨)——或者是想象国家或资本主义企业中一些含混的“殖民地”的或现代主义的精英促进了权威话语并赋予其权力。但是这个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的衰亡,他们却一直没有彻底讲清楚。借用 Dan Sperber 的术语说,我们需要“表征的传染病学(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来解释“为什么某些表征比其他的更有吸引力”。(有关斯佩伯的话引自舒德逊 1989 年著作,第 158 页)。

我认为仅仅文化史不能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她的一条独特历史道路这样的重要问题。除非历史学家对其原因作出解释,否则,我们将会逐渐地被愿意(甚至渴望)解答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排除在关于中国的公共话语之外。即使在对特殊文化现象进行严谨的经验调查时,我们也必须牢记 Charles Tilly 所说的“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我进一步认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档案材料恰好提供了其他地方的社会历史学家一直赖以支持他们研究的那类数据(从国家各社会机构,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也许更重要的警察和审判系统的文件),相应地就有重要的理由和必要的手段来复兴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假如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复兴,它肯定不会返回到从前所做的工作上去。新的社会史将不得不与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联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很有希望)为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提供基础。……

在结束这些散乱的思想时,我要指出 20 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几种新的、极端有力量的人,他们包括:新的专业人士(银行家,记者等),军人(他们已经主宰了中国政治)和控制了大部分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城市帮会与乡村土豪。民国时期由军人主宰的国家推行了专业人士的现代化计划。他们一起追求秩序、纪律、效率和国家的发展——到了 30 年代,这些计划带上了相当浓厚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见柯伟林, Kirby, 1984 年著作,第 145~189 页)。因为国家的计划和城市专业人士们基本是现代主义的(也因为他们

的努力,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献资料),他们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但在那种研究中,我们也许忽略了乡村精英们(他们被普遍批评为守旧、落后、狭隘),而且由于这种忽略而未能了解现代中国一个重要主题的意义:城市和乡村精英们之间的疏离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精英内部文化凝聚力和有效政治团结的丧失(如要参考当代的观点,可见汉韦尔, Hanwell, 1937 年著作)。

但是我更要强调帮会和土豪的作用。对这类所谓的“豪强”要有广泛理解。他们包括上海的青帮、四川的袍哥、河南或陕西的民团头目、广东珠江三角洲碉堡的头人,以及各类地痞、毒贩,甚至中国各城镇里会党的头目。这些人一直使国家专业人士们的现代化方案遭到挫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只是旧社会顽固的残余。他们被现代主义者们塑造成这样,但事实上他们也是中国现代变革的产物。如果我们仍然受到现代主义精英的话语所支配的文化史的束缚,那么中国的现代性看起来将与西方的没有区别:又是一个关于纪律、理性、商品化、军事化、国家、个人、主体性和(理所当然的)抗拒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类人带进我们的研究范畴里,认识到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既使得普通人能在现代社会里生活下去,又使现代主义精英们加强秩序的方案遭到挫折。这样我们就能对 20 世纪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得到更好的认识。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 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导语: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66~95 页。英文原刊于 Modern China, 卷 21(1995)第 1 期。参考同辑中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以及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收于《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1~292 页。

这篇写于十年前的文章和这期间大陆一批年轻



学者在土改、合作化、“文革”等相关主题上的学位论文乃至专著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实践的重要表现。此文出自海外中国研究名家之手,由于删节之故,或许不能体现作者一贯强调的经验现实与理论思考的融通。不过,文章基于对西方当代社会理论的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研究的预设的反思而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路,已经深深影响了现当代中国革命研究。但愿“话语”、“叙事”不会成为新的理论“话语”。如何更好地综合口述史料与传统史料、心态史观与制度史观、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李康)

原文: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

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19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19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做另一次王朝变迁……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1946年到19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

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塞尔登和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

……

方法论问题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用图6来表示表达、实践以及结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里共有四个分析维度,结构维在左侧,主体维在右侧;表达维在上侧,客观维在下侧:

表达性结构 表达性主体

客观性结构 客观性主体

图6

简单的结构主义者假定结构(上图的左侧)是决定性因素,结构对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简单的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即上图的右侧。对于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来讲,在表达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简单的表达主义者确认表达(上图的上半部)是决定性的,而简单的客观主义者则宣称客观(图中的下半部)是决定性的。

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它假定客观结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比表达性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后者仅仅被看做是前者的“反映”。同样,马克思主义强调结构先于主体。一旦正确分析了生产模式的客观结构,人类行为和事件将是可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位于图表左下方的客观结构这一维度,决定了其他三个维度。

另一方面,一个极端的表达主义—意志主义则坚持表达性主体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在于个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创造性天才——的思想和价值。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表征。正是位于右上方的表达性主体,而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在整个图表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与这些简单的决定性观点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77,1991)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借助于“象征资本”的概念,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达(或“象征”)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predilections)、风格(style)和语言。更进一步的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



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于是,布迪厄通过表明结构既是表达的又是客观的来反对客观—结构主义。同时,他也通过描述表达和个人主体性一样是如何受到结构制约的,来反对表达—意志主义。

此外,布迪厄澄清了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简单的结构主义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表达和客观这样的两个领域。在布迪厄那里,结构仅仅解释了行为或思想的倾向性(habitus),而并不能决定现实中个人的实际选择。同样,简单的意志主义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选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都要受到表达性(或象征性)以及客观性结构的制约。对于布迪厄来说,图表中左右两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甚至连布迪厄也未加反思地把表达和客观的结构看做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象征性倾向和阶级区隔是阶级客观条件的延伸。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被假定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并不相互矛盾的。布迪厄并没有把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作为思考问题。

……福柯同样表明了思考表达性结构的另一种方法——形塑语言和思想的话语结构(discursive structures),更像布迪厄的象征性区隔与倾向约束个人心智的作用方式。显然,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深深地受到语言和话语的结构与实践的塑造。……对福柯而言,在上面的图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和右上的表达性主体,而是左上方的表达性结构。

虽然福柯有着强调话语比实践更重要的倾向,但对我来讲,福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表达性结构的现实可以与客观结构的现实大不相同。因此,客观主义者和表达主义者都是不正确的。图表中的表达维和客观维之间的关系,正如两边的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那样,是相互的,而并不具有单方决定的性质。

粗略的客观主义者和粗略的表达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享的假定,即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保持基本的一致。……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我选择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现

象——农村阶级斗争来透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我试图表明,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和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

土改的官方建构

……依赖于这些分析的农村革命策略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为的客观—结构主义计算基础上的。个体被预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贫雇农反抗地主和富农的阶级革命。雇农和贫农应该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最大收益者。贫雇农将同中农结成同盟,后者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在革命既没有很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所以他们被想象为易于动摇的。争取到中农将使革命运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Perkins,1969;Wong,1973;Lippit,1974)。

这里没有原因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

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小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像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Lippit,1974)。……与此同时,农村和农业却一直困扰于我称为的“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直到70年代末(Huang,1990:16—7,10—11章;亦见Huang,1991:329—330)。……

表达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



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的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一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

村庄阶级结构的客观性现实

……那些我们通常在研究中使用的官方数据,往往过于简洁而且并不包括单个村庄的情况。事实上,共产党向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若干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证明官方对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的真实性。此外,近来公布的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村庄内部的情况。Odoric Wou 1994 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虽然,在此基础上,我相信已经足够得出一些关于客观村庄现实和党的建构之间的不一致的结论。

……

以上的证据表明,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官方建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Huang, 1985, 1990)我已经指出,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是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一个村庄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是大致平等的耕作者。

此外,中国的许多村庄是排外的。……几个世纪的商业化并没有把分散的个别社区真正整合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只是带来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Huang, 1985: 220—222; Huang, 1990: 144—146)。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运动组织者只能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村庄。

共产党的选择

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并且将土地改革和一个个村庄中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区分开来。至少在理论上,党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

但……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做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党的这一选择导致了像韩丁(1966)的《翻身》这样的著作的出现。这本书自我表述为一个村庄里进行的阶级革命的写实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认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的和剥削成性的,不仅因为他们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

然而,从这本书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在张村实际上只有一个佃农,并且没有在村地主。仔细检验,我们发现在张村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阶级矛盾,不如说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村庄内部非同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冲突——这些在韩丁那里都被当做了“阶级斗争”(韩丁,1966)。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表明了,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

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使土改变成要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农民身上演出的道德戏剧性阶级斗争,造成了要在每个村庄拟造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即使是按照党自己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地主的地方。当精确的阶级分析让位于简单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额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夸和提升,把富农错划为地主,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并且,强制要求阶级利益和个人行为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

土地革命的型式

土改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型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型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型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型式。每种型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老解放区,1937—1945

在老解放区,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

购买土地并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社会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当村庄位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发生激烈战斗甚至反复争夺的区域时,村庄内部的极端行动在战局的压力下已经不可避免。……阶级划分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革命理论曾精心设置的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富农之间的区分被完全抹杀了。富农被简单地和地主归为一类,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更重要的是,同样在革命理论里被仔细讨论的划分阶级的物质基础,也让位于武断的定额与阶级标签。当然,这一武断并未消除阶级斗争的激烈和残酷(Friedman et al., 1991:105-6)。

……

解放后,1949—1952

1949年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土改变得比较有序和温和。然而,那种把一切新政权不喜欢的分子,都划为同地主和富农一样的阶级斗争对象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倾向把那些严格说起来距地主和富农成分甚远的人也划进了斗争对象。……

关于阶级斗争的官方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土改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革法》的划分标准。余下的数百万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激进阶段被当做斗争对象的。甚至在解放后更加有序的土改中,仍有很多人被错划被错斗。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错过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被放逐的外来者或者是干部的对头,甚至仅仅因为运气不好……成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技术性失误的牺牲品。党的宏观结构分析在每一个具体村庄里的教条应用,产生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偏离。

……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共产党的建构和行动所认定并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

那些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并不必然是地主和富农,反倒常常是中农和其他阶级的农民。地主和富农同样并不必然支持国民党……但是土改中使用的定额和阶级标签并没有给这些模糊提供相应的回旋余地。在极端的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观点中,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的联系被认为必然是确切无疑的。

从意识形态到话语

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参与了土地革命,他们组织工作队进入每一个村庄以推动土改在全国的进行。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这样一项努力:把革命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并改造现实以符合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土改结束时,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和思想:把“阶级”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转化为在每一个村庄上演的善对恶的戏剧化斗争中的象征—道德意义。

正是在土改中,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地方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次革命中,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掌握了物质领域,而且控制了象征领域,革命行动进行时并未顾及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由于党明显的成功,或许还因为他们自身对农村的陌生,城市知识分子们忽略了这一对客观现实的偏离。看起来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自愿参加了在农村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官方的表达建构。通过戏剧、小说、电影、教科书、政治学习以及无所不在的官方报刊,这一代的语言和观念传递给了下一代。

这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建构和宣传。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土地革命的过程和虚构,把官方建构作为自己思想世界自愿调整的一部分。阶级分析的理论语言和对地主形象的革命描述已经成为整个一代人使用的日常语言。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了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

官方认可的农村阶级斗争话语,不仅成为阶级话语中的主导,而且统治了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所有话语。直到文革结束之时(期间只有在大跃进之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回潮),政治一直主导着所有的生活领域,而在政治话语中,阶级话语又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它成为这一阶段里几乎所有群众运动的引导力量: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运动,直到最后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在文革中,主导性的标语是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阶级身份、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斗争对象这些术语完全渗透进了标准的日常语言。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生产关系分析中的细微标准已经不复存在。所有革命中的敌人都被合并成阶级敌人这个单一范畴,他们代表了旧社会所有的罪恶。在如此混乱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关于阶级敌人的四种类型(“四类分子”)的惯用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即罪犯)。在这样的惯用语中,作为人民的敌人,阶级敌人的危害性要大于罪犯。这些惯用语成为“文革”中主要的战斗口号。

无论斗争目标是党外的老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走资派”这种新阶级敌人,“文革”中使用的语言、思想、甚至行动的仪式,都是从土改那里借用来的。“文革”积极分子思考和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四类分子”或者是“黑五类”)、识别斗争对象,在开群众斗争大会时,给斗争对象扣上高帽,在他们胸前贴上标语,公开地侮辱、殴打,等等。这些都是土改中使用过的技术。

……

作为前奏的四清(略)

农村的文化革命(略)

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

……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那些农村里面的、被想象成威胁革命的老阶级敌人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一次又一次被斗的替罪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国有化,所以他们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连资本主义右倾分子,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从有影响力的重要岗位清除出去。唯一可以想象的新资产阶级敌人的客观基础,是那些身居高位、享受特权的当权者。但“文革”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毛并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就使得阶级成了一个完全由政治态度决定、和任何物质基础无关的东西。于是,对于以假定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作动力的“文革”来讲,其表达

现实的古怪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建构的结果可以称为表达主义的政治。因为除了以往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旧标签之外,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位置,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政治态度和行为。又因为在“文革”群众斗争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主要由别人的感知而决定,所有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方式。区别资本主义敌人和社会主义朋友的唯一标准仅仅在于表达。

土改中尽管出现了表达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但依然存在着判断表达的客观检验:阶级范畴植根于物质财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土地改革法》中是得到客观定义的。依据这一客观标准可以纠正那些错贴的标签。表达现实保持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并受到后者的检验。

但“文革”并非如此。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成为阶级敌人的后果和土改时期一样严重,并且其遭遇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中更为可怕。“文革”的真正悲剧在于模糊的表达主义政治与土改的暴力手段的结合。

……

对“文革”的学术研究(略)

结论

……

正是在“文革”中,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和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整个崩溃。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无辜者并普遍使用残暴手段,最终只能产生人们的虚伪心态或强烈反感。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官方通讯社制造的空洞口号,只被充满怀疑的人们挂在口头。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阶级斗争话语背后的权威消失了,于是,这一曾经完全统治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话语突然地完全崩溃了。

……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仅是那些对霸权话语和一个卡理斯玛角色的盲从,而且还要理解被这一运动所引发的矛盾、深刻的反思和反感。这也就是“文革”为什么不仅标志着阶级斗争和霸权话语的高峰,而且也是它的崩溃的前兆。这也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实事求是”所替代的原因。



伊格尔斯: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

导语:

伊格尔斯:《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选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九章,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35页。

本文介绍了年鉴学派第二代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日常生活史、法国心态史、意大利微观史学等多种探究日常生活的历史性社会研究,特别关注了如何认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联、如何认识“日常生活”、如何认识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之间的差异等论题。

我国台湾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参考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刊于《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59页。参考邢义田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按专题分为十三种,其中尤以《生命与医疗》、《生活与文化》、《妇女与社会》等值得参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新史学》两份杂志也有大量相关论文。

(李康)

原文: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仅是西方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也有东欧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质疑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前提了。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世界观,其关键在于相信现代化乃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信仰的最激进的形态是在弗兰西斯·福山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中提了出来的,它宣称现代技术性的社会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而伴之以代议体制,就标志着作为历史发展产生的事物合理秩序的成就。其他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家们,像是于尔根·柯斯卡,则远没有那么信心十足,他们察觉到了现代社会的破坏性方面,然而却表现出对现代化的整体的积极性质的信心,在其中市场经济与一种高度发展的技术就会伴之以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保证公民的自由、社会的正义和文化的多元主义。在柯斯卡看来,纳粹主义以及东欧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的崩溃,就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看法是,批判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关键功能就是要指出妨碍

了真正现代社会的20世纪社会秩序的返祖现象,正如韦勒和他两人在他们分析1945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所曾做过的那样。

对于卡罗·金斯堡(Carlo Ginzburg)和卡罗·波尼(Carlo Poni)这两位意大利微观历史学最重要的代表来说,宏观历史观念以及伴随着它们的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法之所以衰颓的关键原因,应该恰好是求之于对技术进步的有益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丧失了信心(见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1991)。反对宏观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论据则是根据政治的和伦理的理由甚至更有甚于根据方法论的理由,尽管……意大利学派特别要使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基本前提服从于探索性的方法论批判。对以现代化为其特征的世界历史过程之关键性的反驳,在他们看来乃是以人为其代价。……人民在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中,正如他们在把焦点置于在上的权势者身上的传统政治史学中是一样地被人忽视。历史学必须转而面向种种日常生活的情况,正如它们是被普通人民所经历的那样子。但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结构》一书中向他们所提供的那种日常生活史,却由于只关注物质条件但未能考察这些情况都是怎样被人经历的而未能触及要点。

我们已经指出了各种政治信仰不仅是在较老的政治史学派的学术研究中、而且也在晚近的社会史学的形式中(并且当然也在马克思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它们起着同样的作用,并且或许在新的日常生活的微观史研究中,起着更加显而易见的作用。意大利有许多历史学家,也像他们英国的许多同行一样,开始时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却转而朝向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学的基本概念挑战——这一点并非偶然。对于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历史研究的主题已经从他们所称为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转移到了多数人,而这些多数人在他们看来绝大部分都是并未得利的人和被剥削的人。这种对于未得利和剥削的强调,就把这种历史学和古老的有关大众生活史的浪漫传统……区别开来……

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并不把多数人看做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看做是决不能消失在世界历史过程之



中、也不能消失在无名的群体之中的各个人。爱德华·汤普逊……宣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可怜的袜工……(和)默默无闻的手织工……从后世无比的轻蔑态度之下解救出来”。但是假如我们希望把无名的人从备受漠视之下解救出来,就得号召有一种新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历史学研究途径,它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而且假如我们是在研究多数人的个人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认识论和这些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配套,它能让我们获得有关“具体”的而不是有关“抽象”的知识。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有两个人的著作准备好了把文化定位为牢固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语境上的一种历史学,那就是乔治·杜比论婚姻、民族神话的延续和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大作(George Duby 1993, *The Knight, Lady and the Priest: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1980, *The Three Orders: Feudal Society Imagined*)和雅各·勒·高夫论知识分子与教士和工作的概念与类型的著作(Jacques Le Goff 1993, *Intellectuals in the Medieval Ages*)。勒·高夫和杜比也成功地写出过一部社会文化史,叙述以及个人占有着其中的中心地位,例如杜比论1274年7月27日星期日的布凡尼战役就是把一桩历史事件转化为一种民族神话(1973/1990, *The Legend of Bouvines*),以及最近雅各·勒·高夫1996年的圣路易传记一书。在整个20世纪的70年代在英语世界和意大利语世界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变得越发地常见了,例如Keith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16—17世纪欧洲民间信仰研究》(1971)、Peter Burke的《早期近代欧洲民间文化》(1978)、Natalie Z. Davis的《早期近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1975)和卡罗·金斯堡的《奶酪和蠕虫:一个16世纪磨坊工的宇宙》……

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然而在

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宣扬者们(他们在号召严格地概念的和分析的指导路线)和日常历史学的倡导者们(他们……热衷相信活的经验才应该是历史学的真正题材)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Hans Medick在一篇关系重大的论文《划船里的传教士》(1984,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987, 76—98)中力图揭示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立场。就这种历史学而论,70年代和80年代以克利福德·盖尔茨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可以看做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模型。这一符号学的研究路数乃是盖尔茨的“重笔描述”这一概念所追求的,它意味着在和另一种描述的直接对抗。它也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预设的概念读给对方接受,而只是要如实地重新捕捉它。然而在这一点上,盖尔茨和梅狄克两人变得陷入了一场显然的矛盾之中,因为他们所号召的那种重笔描写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个人,而只是接触到他或她所陷于其中的那种文化。于是,那个“可怜的织袜工”——汤普逊是着手要把他的个人尊严从非个人的历史的势力之下解救出来的——又把自己的个性丧失给了文化,因为我们只能是通过塑造出他或她来的那种文化才窥见到个人。按照盖尔茨和梅狄克的想法,无论是人种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没有对别人经验的直接接触。因此他就只有通过象征性的和仪式上的行为不断在间接地猜测这些经验,这些行为是在个人的意图和行动的直接性之下进行,它们就构成成为一个文本使人可能接触到另一种文化。

柯斯卡批评了梅狄克的研究方法,说它是一种“新历史主义”(不可和前面讨论过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混为一谈),根据的是两项理由:正如较老的历史主义一样,它断然摒弃了理论,而且在柯斯卡看来它坚持直接的经验就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非理性主义。如果我们不从清楚明白的问题去观察——那会帮助我们在浩瀚无垠的经验中定位出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就无从具有某种对现实的一贯洞见。而在梅狄克看来,以精心概括出来的各种问题去研究我们的主题,这种做法本身就歪曲了我们的发现;但在柯斯卡看来,没有这些问题就使得有意义的知识成为了不可能。再者,在柯斯卡看来,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就会使得历史知识成为了不可能而且导致历史学的繁琐

化。因此就有一种危险,即日常生活史可能退化成为轶闻逸事和发思古之幽情。

可是梅狄克认为,“小的才是美丽的”一点都不不是指脱离了更大的语境之外的轶闻逸事史。事实上,梅狄克坚持说:历史学应该从对“中心”体制的关怀转移到边缘上面去,在那里可以发现并不符合既定规范的每个人。然而,个人却只能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为人理解。因此他所追求的微观史,缺少了一个宏观社会的语境便不能成立。不仅是梅狄克在德国所提出的 Alltagsgeschichte(日常生活史),而且也还有它那些意大利的宣扬者们……所构想的微观史,都设定有一种综合性的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就有了朝着历史人类学的转向及其对文化象征表现的符号学研究途径。……

20 世纪的 80 年代,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原型工业化研究组的主要参加者汉斯·梅狄克和 Jürgen Schlumbohm,再加上当时也在这个研究所的一个美国人 David Sabeau……考察了一个特殊区域的进程……在某一层次上,这是老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继续。极其大量的数据被锁入了计算机,特别是有关结婚与死亡时的财产清单以及生命统计、审判记录、识字率,等等。结果便有了大量有关文化的信息。例如,财产清单就给出了书籍拥有量的信息。焦点便放在从旧制度到 19 世纪后期大约两百年这段时期内的某个村落或地方。尽管他们对盖尔茨频频表示敬意,但他们的研究路数却大为不同。他们是以当时他们所诠释的过硬材料和社会学数据、而不是以重笔濡染在进行工作的。把文化当做是一种整合的符号学体系那种盖尔茨式的概念……便被一种看出了分化与冲突的概念所取而代之。此外,在由前近代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的语境中,就出现了地方史。尽管这些历史学家们不喜欢现代化这个概念,他们却怀着对这些“代价”的警惕而在运用它。因此,他们就比自己所认可的更为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并更加远离了历史人类学。

在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德国人类学与微观历史学的史学家和意大利的微观历史学(microstoria)的实践者双方之间既有巨大的相似之点,又具有根本的分歧之点。尽管他们的政治观有相似之点,他们却是来自两种不同的传统。意大利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卡罗

·金斯堡、卡罗·波尼、乔凡尼·列维(Giovanni Levi)和爱多阿多·格伦狄(Edoardo Grendi)开始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增长概念所共有的那类宏观历史概念丧失了信心。他们希望再度赋给历史学以一种人间的面貌,这就导致他们不仅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反对分析的社会科学和年鉴派。年鉴派避免了前两者的狭隘性,但是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大厦,正如列维指出的,仍保留有很大空间可以容纳大量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研究路数,可是竟然没有人入住。

Microstoria 的实践者们,也像他们的德国同行们一样,想要回到具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上来。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种因素,其中有两种是他们与德国人所共有的: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各种经济力量……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没有它们历史便不可能为人理解,尽管不平等采取了各种远远超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之外的形式……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他们在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同时却避免了由盖尔茨所宣告的并被梅狄克在他有关传教士的论文中极为认真采用过的这一信念:即,历史学是从诗歌中获得它的许多洞见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立场也曾被海登·怀特所宣扬并被美国的文化史学家们(例如那塔利·戴维斯,1987,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所采用过,对于他们来说——至少是在他们方法论的论述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流动不居。对于 microstoria 的实践者来说,这条界线倒是并不很流动。他们坚持认为,历史学家所处理的乃是一项真实的题材。他们批评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路线,倒并非说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或是不该要的,而是说社会科学家作出了某些概括,而当用于检验他们号称要加以解说的那种小规模的生活的具体现实时,却是无效的。然而无论是在德国取向还是在意大利取向的著作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有某种矛盾。当意大利人对他们认为的盖尔茨方法论的非理性主义始终抱有怀疑的时候,他们(而尤其是金斯堡)却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中也在靠

拢盖尔茨那种重笔濡染的立场。相反地,德国人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工作,包括对漫长系列进行计算机分析。

和德国的微观历史学家们不同,意大利人在 *Quaderni Storici*(《历史学季刊》)杂志上拥有一个组织上的巩固根据地,它自从1966年创刊以来就在意大利占有一席颇有似于《年鉴》在法国和《过去与现在》在英国的地位,成为了视野广阔的各种历史研究的一个论坛。在德国,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历史与社会》)也起着这样一种作用,但却有着更强烈得多的社会科学取向。只是随着1993年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历史人类学》)的创立,才出现了一份代表微观历史学与历史人类学观点的德国杂志。

引人注目的是这份新杂志的第一卷刊登了卡罗·金斯堡一篇论意大利 *microstoria* 传统的文章。……宏观历史学的危机乃是20世纪70年代对那些宏伟的叙述之日益增长的幻灭感的一部分。立足于大量数量化的、计算机化的数据之上的大规模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质疑,倒并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不能应用的,而是因为大规模进行概括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真正的现实。按微观历史学实践者们的说法, *microstoria* 的一项基本承诺就是要向“被其他方法所遗漏了的人们打开历史的大门”,并且要“在绝大部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

被 *microstoria* 的拥护者与福柯和盖尔茨的拥护者双方所宣扬的理论立场与方法论立场之间,既有亲和力和,但也有显著的差别。他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表明“霸权体制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就像是金斯堡在他对磨坊哲学家和宇宙学家 *Menocchio* 的个案研究和列维在对乡村牧师 *Gioan Battista Chiesa* 的个案研究所做过的那样。他们也像盖尔茨一样,目的是要对文化进行一种“解释性”的研究,而那必须是“通过单独的、貌似无关重要的象征,而不是通过可重复的和可量化的观察所得出的规律”来着手进行的。用列维的话来说:“微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在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却一直坚持认为,在历史文本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是可以为人知道

的。他们承认,其中掺入了知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微观历史学方法“就和把现实作为是客观存在的那些历史学家们所采用的传统陈述式的权威论述的形式分道扬镳了”。由于又回到了专业化历史编纂学以前的那种表现形式, *microstoria* 便引进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是传达了自己的发现,而且也传达了自己的操作程序。“在微观历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就变成为叙事的一个内在部分”。叙述对于表现历史学家的发现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可以传达以抽象的形式所不能传达的各种成分,也因为表明了历史学家所由之以达到自己的叙述的那个过程。

然而尽管对客观性加上了这些限制, *microstoria* 却与更古老的社会科学共同享有几项基本的设定,使它有别于福柯的和盖尔茨的研究路数。Edward Muir 指出,就福柯而言“各种理论都是不能证实的,因为证实的标准是出自要使过去符合于现在的那种现代科学规范。正确性就是指与被一种规范或被一种体制所界定的事物秩序符合一致”。对金斯堡和列维而言,这是“一种逃避。正确性必须是由过去向我们提供的具体的、物理上的真凭实据来决定的”。*Microstoria* 并不全盘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但它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建构理论。它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质疑盖尔茨对文化的研究路数。尽管盖尔茨声称他处理的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他却坚持把文化当做一个整体体系、当做一个整体的那种宏观社会概念。正如列维指出的:“我觉得微观历史学与解释性的人类学之间在观点上的主要分歧之一便是:后者在公共的符号与征象二者之间看出一种一致的意义,而微观历史学则力求参照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表现的多重性来界定它们和衡量它们”。那结果便是有一个由“社会分化”所标志的社会。在这里,有关霸权与社会不平等的各种考虑——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关注——就形成了微观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我们将简略地考察一下 *microstoria* 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即卡罗·金斯堡的《奶酪与蠕虫:一个16世纪磨工的宇宙》(1975)和乔凡尼·列维的《继承的权力:一个魔法师的故事》(1985)。……金斯堡的书已经成为一部经典著作,或许也因为它读起来是那么



好,而且呈现给了我们一个异常之丰满的个人。列维笔下的魔法师则更其深入得多地被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而且那文本也更其分析的。两部书都有着 *microstoria* 的一般特征,即专注于一个给定地点的某个人,并且力图强调该地方背景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之点。两部书都精心重建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焦点又都是放在地域性的而非更广阔的跨地区的层次上。然而金斯堡对他的主角梅诺奇奥的研究途径要比列维的更加是解释学的。主要的焦点放在了梅诺奇奥的心灵世界上。而进入他心灵的那条途径则是通过他所阅读的文本。阅读并不是一种可以借之传达意义的非个人的过程,倒不如说那是精英心灵的著作通过了大众文化的三棱镜而射入这位农民磨坊主的心灵之中。而金斯堡本人的想象力对于重建梅诺奇奥的思想历程也是要害所在。书中的叙述是受到了作者所提出调查策略的干扰的。列维的关注则更加是在社会科学上,它要检验或纠正已有的各种假说。它往往用许多段话来说出所要肯定的假说。其中中心的关注则是乡村中权力关系的模式。用经济因素或政治制度的术语是理解不了这些的。列维质疑的是,市场非个人的各种力量和近代国家机器的发展就决定了这些权力关系到一个什么限度。他论证说,要理解农民世界,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对难以捉摸的象征性的财富(即权力和威望)的保持和接受”。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也叙述了从土地买卖的数据到家庭组织和继承的数据,从而证明了在乡村中运作着的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盲目的市场、而是一个复合的市场,其中社会的与个人的关系(包括家庭的策略)对确定价格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没有矛盾的、高度凝聚的农民社会之牧歌式的形象,就在这种分析的过程之中瓦解了。

……

微观历史学家的理论叙述和他们的实际研究及写作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他们正当地强调了历史中的不连续性,并由此推论出来:任何宏伟的叙述都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是以一种大抵上对现代化是负面的评价在进行操作的。尽管他们发现他们所研究

的近代社区中也有种种冲突和分裂,然而他们却是怀着一定程度的恋旧之情在观察它们的消逝的。那就是说,他们之转向微观史的社区,并非仅只是因为材料可以对它们从微观史角度进行研究,而且也因为他们对近代世界抱有某种厌恶之情。有许多年鉴派的历史学家很可能是受到同样驱使而转向中世纪或早期近代世界的。在近来许多人类学定向的著作中——例如 Eric Wolf 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各民族》(1982)与 Sidney Mintz 的《甜蜜和权力:近代史上的糖》(1985)——被看做是一种破坏力量的现代化,就构成为研究欧洲对非西方世界扩张中的一条红线。这也往往就是中世纪研究的情况,例如前面提到的雅各·勒·高夫有关近代的时间概念的起源《中世纪的时间、工作与文化》的那篇名文。尽管福柯强调历史并没有统一性而是被“断裂”所标志着的,然而他有关精神病、诊疗所和监狱的那些著作却又设定近代史的历程是以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规范为其特征的。……而这也是诺伯特·埃利阿斯那部实质上是一部宏观史的《文明史进程》一书的主题……

有几种批评曾经反复被提出来,用以反对微观历史学家们:(1) 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专注,就把历史学归结为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2) 他们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3)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因为他们着意要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能研究以迅速变化为其标志的近代和当代世界。(4) 就此而言,他们便没有能力研究政治。

然而,也曾作出过认真的努力,要用微观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 20 世纪的政治冲突。把近代与现代的日常生活史 (*Alltagsgeschichte*, 参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和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微观史联系起来的,则是要致力于走出非个人的社会结构与过程之外而钻入到具体的人生经验之中。……微观历史学再一次被看做并不是对大规模社会与政治过程分析的代替品,而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微观历史学的调研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被传统史料所忽略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传记和回忆对于重构他们的生活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显然,在大多情况中这些资料是无法利用的。又是在这里,口述历史便可以作出贡献。口述历史曾特别用之于研究



受害者,而近来也还有“holocaust”的罪魁祸首,但最近则是斯大林式的迫害与屠杀的受害者和罪魁祸首。无可讳言,访问也有问题,特别是这些搜集都是在几十年之后,这时被访问人的记忆已经受到后来事件与经验的影响。然而访问可以由其他的证据或其他的访问加以核对来证实。地方史研究小组往往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表达普通平民的生活经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类方法特别是在德国、而近年则是在苏联,已经被用来作为最近历史重构工作的一部分。

.....

这就再一次把我们导向微观历史学的实践者们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他们反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关键论据便是:这样的历史学就剥夺了已往历史的质的那方面,而没有给它留下一幅人间的面貌。问题是怎样才能够重行捕捉历史中的人间的和个人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汉斯·梅狄克在克利福德·盖尔茨的文化人类学的“重笔濡染的描述”中就发现有这样一种历史的典型。历史学也像人类学一样,乃是一种解释性的而非一种系统性的科学。冷静的分析是被一种难以言传的顿悟所取而代之。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重笔濡染的描叙式的知识论包含有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它把它的研究题材看做与观察者全然不同。它正确地警告说,不要把观察者的思想

范畴投射到被观察者的身上。重笔濡染的描述,应该使得“另一个人”以他的或她的“另一个人的性质”呈现于观察者之前。这就赋予了观察者的主体的一种“客观性”的成分,并使之呈现为一个被嵌入现实之中的客体。而另一方面,这种人类学的研究路数也就是在向世界的客观性挑战。它把别人看做是需要加以阅读的文本,非常之像是阅读一篇文学的文本那样。然而,一个文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阅读。这种研究路数的逻辑后果,将会是取消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但事实上,这并非微观历史学家的本意。在他们努力要复原他们所研究的男男女女们的主体性与个体性的时候,他们摒弃了种种充满说不清的社会科学构造和过程的成见,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学家也在他们的工作中认定是在面对着一种真实的题材的。在他们努力接近这一题材时,他们非常愿意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工具。.....尽管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意大利人比他们德国的同行们格外着重于思考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且更少依靠计算机,然而他们却拒绝他们认为是盖尔茨方式的那种文化人类学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归根到底,微观历史学看来并不是在否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语境)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历史学家们就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

